

《歐美研究》第四十七卷第四期（民國一〇六年十二月），471-527

©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http://euramerica.org>

美國重返亞洲對中日兩國 戰略競爭的影響 (2011-2016) ——安全困境理論的分析視野

陳亮智

環球科技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64063 雲林縣斗六市嘉東里鎮南路 1221 號

E-mail: liangchihevanschen@gmail.com

摘要

美國重返亞洲對中日戰略競爭造成什麼影響？本文認為，中日兩國的戰略競爭是隨著美國重返亞洲而迅速地走向惡化。原先美日同盟所具備之「嚇阻中國及北韓武力威脅」與「壓制日本再軍事化」的雙重作用，一方面正被中國迅速的軍備擴張所突破，另一方面則是被日本安全政策的改變所挑戰。其關鍵乃是北京在經濟與軍事上的崛起。此發展已悄然地改變 Thomas Christensen 於 1999 年所提出的論點——美日同盟的建立可以降低中日之間的安全困境問題，並削弱雙方發生軍備競賽、軍事衝突、戰爭的可能性。

關鍵詞：重返亞洲、戰略競爭、安全困境、美日同盟、軍備競賽

投稿日期：105.10.7；接受刊登日期：106.9.9；最後修訂日期：106.7.11

責任校對：蔡旻芳、廖玉仙、曾嘉琦

壹、導論：美國重返亞洲對中日兩國戰略競爭之影響為何？

一般普遍認為，美國「重返亞洲」(return to Asia or pivot to Asia) 與「對亞洲的再平衡」(rebalance to Asia) 乃是在「中國崛起」(China's rise) 的脈絡下所做出的具體回應。許多國際關係研究者與觀察家亦認為，華盛頓之所以重新回到亞太地區，並且在此做出再平衡的策略，基本上是為了回應國力迅速攀升的北京，以及北京對東亞區域安全所可能形成的威脅。¹ 為此，美國遂與許多亞太國家展開一系列的軍事交流合作，這些國家包括了與華盛頓有軍事同盟關係者，例如日本、南韓、菲律賓、泰國與澳洲，以及與華盛頓沒有軍事同盟關係者，例如越南、印度與中國。而在此當中極受矚目與被廣為討論的國家即是日本，以及由他們所組成的「美日同盟」(The U.S.-Japan Alliance)。

美日同盟之所以受到重視，除了東京是華盛頓在亞太地區最為堅強的盟友之外，該同盟關係更是跨越了過去冷戰時期與後冷戰時期，以及現今大國崛起時期等不同階段，實質地支撐了東亞區域秩序與安全穩定的重要基礎。然而，隨著中國總體國力不斷地增強，以及它經略遠洋的企圖與能力持續地提升，加以美國重返亞洲，以及日本集體自衛權解禁與新安保法案通過等，華盛頓、東京與北京三者之間的戰略互動益形複雜且充滿了挑戰性。事實上，當前東亞區域的安全與穩定一方面是受到一個「較大框架」之美中兩強的戰略競爭所影響，另一方面則是受到一個「較小框架」之中日兩國的

¹ 有關「美國重返亞洲」與「中國崛起」之關連性的研究文獻，請參考史坦伯格、歐漢龍 (2015); Clinton (2011); Friedberg (2011); Libenthal (2011); Mamnyin, et al. (2012); Ratner (2013)。

戰略競爭所牽動。在中國崛起與可能的安全威脅之下，美國與日本則是具有共同的戰略目標——共拒中國潛在的軍事安全威脅。正因為美國與日本之間締結著美日安保條約 (The 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1960)，於是當美日雙方中的任何一方與中國出現戰略競爭、軍備競賽、軍事衝突、甚或戰爭時，另一方似乎無可避免地會被「捲入」(entrap) 其中。換言之，美中兩強之間的戰略互動 (較大框架) 與中日兩國之間的戰略互動 (較小框架) 是相互牽連的，而連結兩者的正是「美日同盟」與「美日安保條約」。簡言之，東亞或西太平洋的地緣政治格局可以化約為「美國+日本」與「中國」兩者之間的戰略競爭與互動。

就中日兩國的戰略競爭而言，雙方除了受到揮之不去的歷史遺緒 (historical legacy) 影響外，彼此在地緣政治 (geopolitics) 上亦存有根深蒂固的衝突與競爭關係。總括而言，北京與東京的齟齬主要涵蓋以下三個面向：(1) 對歷史的認知與態度問題；(2) 對東中國海釣魚臺列嶼的主權歸屬問題；² 以及 (3) 對對方之軍事現代化與軍備發展的疑慮問題。首先，在「對歷史的認知與態度問題」上，北京與東京近年來仍持續原地踏步，雙方並無實質地突破。雙方主要的衝突議題包括有：兩次中日戰爭的責任歸屬與道歉，以及日方內閣官員之參拜靖國神社等。其次，在「釣魚臺列嶼之主權歸屬與領土爭議」上，北京與東京則時有針鋒相對與衝突摩擦。2010年9月，日本海上保安廳巡邏船和中國漁船在該海域附近發生擦撞；2012年4月，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提出購買釣魚臺列嶼的主張；2013年

² 基本上，我方以「釣魚臺列嶼」稱呼，日方則以「尖閣諸島」為稱呼。為了行文的方便，本文後續皆以「釣魚臺列嶼」表述。

11月，中國則逕行宣布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ADIZ)，如此以反制日本在該年5月擴大防空識別區的作為。³ 爾近，除了東海島嶼的主權爭議之外，中日雙方也因為南中國海的主權爭議而出現嚴重的歧見與齟齬。再者，在「軍事現代化與軍備發展議題」上，2012年9月，中國第一艘航空母艦遼寧號正式成軍下水服役；該艦的加入被視為是中國海軍建軍的重要里程碑。對此，日本則表示，中方並未就此向日方做出說明，但日方則一向認為中方的軍事現代化少有透明化，日本將審慎地觀察該艦的任務與目標 (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2012)。另一方面，在歷經國內長時間辯論與衝突之後，日本當前執政的自民黨安倍晉三內閣於2014年7月宣布，正式決定修改憲法解釋以解除對「集體自衛權」(rights of collective self-defense) 的限制。當中便認為，即使國家自身未受到攻擊，日本也可以為了阻止針對他國的攻擊而行使武力 (路西，2014)。2015年3月，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最大噸位數的軍艦——直升機護衛艦出雲號 (JS Izumo, DDH-183)，正式加入海上自衛隊。若干觀察家即指出，出雲號的下水服役正是為了與中國海軍 (尤其是潛艦) 進行相互的抗衡 (LaGrone, 2015; Parameswaran, 2015)。2015年7月與9月，日本眾議院及參議院分別通過所謂的新安保法案，即和平安全法制整備相關法與國際和平支援法兩法，將美日同盟所涵蓋的範圍從日本周邊擴大到全球，並且強化日本主動反應的角色。對此，北京則是保持高度地關注，並且希望東京能記取歷史教訓，在軍事發展上謹慎而為，不要危害了亞太區域的和平與穩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5)。

³ 根據東海防空識別區的設立，北京要求在區域內航行的航空器得向中國通報飛行計畫，對不配合識別或拒不服從指令的航空器，中國的武裝力量將採取防禦性緊急處置措施。

從以上的發展軌跡看來，中日關係的前景似乎並不樂觀。事實上，存在於北京與東京之間的恩怨糾葛乃是由來已久，而此恩怨情仇又導致兩個國家嚴重的互不信任。對日方來說，中國崛起將帶給日本極大的威脅感，因為中方或有報復日本之發動兩次中日戰爭的企圖；對中方而言，日本集體自衛權的解禁與新安保法的通過又讓中國充滿了不安全感，因為中方擔心日本可能再次成為軍事強國。於是乎，中日雙方遂延續並加深了原本即存在於兩國之間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 問題。⁴ 值此之時，美國重返亞洲與對亞太地區進行再平衡的動作究竟會對中日兩國的戰略競爭造成什麼影響？華盛頓在亞太地區的軍力重新部署可否緩和北京與東京之間的劍拔弩張？亦或是剛好相反，華盛頓的作為恰巧正在激化兩者走向更進一步的戰略競爭或軍事衝突？這些問題正是本文的核心關懷意識。

有關本文主題的探討，主要是源自於對柯慶生 (Thomas Christensen) 教授於 1999 年在 *International Security* 所發表之論文的反思。柯慶生於文中認為，美日安保條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用以維持東亞安全與穩定最重要的基石。尤其是後冷戰時期，其所建構的美日軍事同盟非但有嚇阻中國及北韓武力威脅的功能，同時也有壓抑日本再軍事化 (remilitarization) 的作用。換言之，美國是透過該同盟的建立，形成了所謂的「雙重壓制力量」，以降低中日之間的安全困境問題，並減少雙方發生軍備競賽、軍事衝突，甚至是戰爭的可能。此「雙重」壓制力量分別為：其一、透過美日軍事同盟以制衡中國對日本可能的安全威脅；其二、反對日本的再

⁴ 有關探討中、日兩國之間安全困境問題與發生軍事衝突可能性的文獻，請參照張雅君 (2005); Bush (2010); Christensen (1999); Hornung (2015); Liff & Ikenberry (2014)。

軍事武裝以避免日本對中國造成刺激與威脅。⁵ 準此，美國在東亞的駐軍對中日兩國之間的戰略競爭與安全困境具有一定的穩定作用。然而本文卻認為，極為弔詭地，此一雙重的壓制力量已經被兩股力量所挑戰——其一是北京正在快速進行的軍事現代化與軍備擴張；其二是東京所推動集體自衛權解禁與新安保法案通過。前者乃源自於中國經濟與軍事實力的提升；後者則是來自於日本自我的推動，以及美國的允許與支持。也因此，傳統上被認為是最具有抑制中日兩國發生軍事衝突的美日安保體制，在美國尋求強化與日本的軍事合作，並且鼓勵它重新定位其安全政策之際，華盛頓則是鼓動、激化了北京與東京兩者走向軍事衝突的一端。換言之，華盛頓對北京與東京之間的戰略競爭與安全困境影響，已從原先的「緩和作用」轉換成為現今的「激化作用」。

事實上，以上的轉折背後有一個很重要的時空環境變遷——北京在經濟與軍事上的崛起。柯慶生的分析是在 1990 年代末期 (1996-2000) 所為，當時北京與華盛頓及東京在經濟規模與軍事經費投注上皆有明顯的差距。但是到了 2011 年至 2016 年此一時期，北京在軍事預算上雖仍然落後華盛頓許多，但在經濟規模上則直追華盛頓；而北京在經濟規模與軍事預算上則是雙雙地超越了東京。首先在經濟方面，根據聯合國的資料顯示，1999 年時，美國為世界

⁵ Christensen (1999: 49-80). 持相同看法的還有 Michael Mastanduno (2002: 197)。在對日本的部分，若干學者即提出「瓶蓋理論」(bottle cap) 與「蛋殼理論」(egg shell) 的比喻，用以描述美國壓制日本再軍事化的強大潛力，或是美國支持日本發展軍力，但必須是在它的保護之下 (Christensen, 1999: 62, 2011: 236)。事實上，美日同盟是一個極為特殊型態的軍事同盟，華盛頓一方面希望建立美日同盟，但另一方面不希望日本過於強大。同盟本身由美國主導即可，如此中日之間的安全困境與戰略競爭自然會受到壓制。因為一個軍事力量強大或再軍事化的日本，反而會刺激中國，如此既不利於日本，也不利於美國，Michael Beckley (2015: 20-21) 認為美國可以藉此避免陷入同盟的糾結 (entanglement) 當中。

第一大經濟體，國家總生產毛額為 9,301,000 百萬美元，占世界 GDP 的 29.66%；日本是第二大經濟體，國家總生產毛額為 4,432,599 百萬美元，占世界 GDP 的 13.93%；中國為第七大經濟體，國家總生產毛額為 1,100,776 百萬美元，占世界 GDP 的 3.51%。⁶ 總體來說，中國的經濟實力遠低於美國與日本。但是在 2016 年時，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所顯示，美國仍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國家總生產毛額為 18,569,100 百萬美元；中國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家總生產毛額為 11,199,145 百萬美元；日本則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國家總生產毛額為 4,939,384 百萬美元。就此來看，中國的經濟規模已超越日本。⁷ 其次在軍事預算方面，在 1999 年的時候，美國的年度軍事預算為 399,787 百萬美元，日本為 40,685 百萬美元，中國則為 39,829 百萬美元，此時中國的年度軍事開銷低於日本。但到了 2016 年時，美國的年度軍事預算為 606,233 百萬美元，中國為 225,713 百萬美元，日本則為 41,569 百萬美元，此時中國的年度軍事開銷已是遠遠地超越了日本。⁸ 的確，在十七、八年之前，當北京的經濟與軍事實力仍未真正崛起時，華盛頓或可採取柯慶生所謂的「雙重壓制力量」，以避免東京與北京陷入安全困境的邏輯，而從事激烈的戰略競爭，進而危及東亞的區域安全。但是，在十七、八年之後，當北京已真正崛起，並對華盛頓與東京造成安全威脅時，東京與北京之間的安全困境問題已悄然被掀開來，美國則必須更加強化與日本的同盟關係，以共同嚇阻來自於中國的安全挑戰。

本文主要的觀察時間是從 2011 年至 2016 年。其理由有二：第一、美國重返亞洲是歐巴馬 (Barack Obama) 總統任內對亞太地區

⁶ 參考 United Nations (2016)。

⁷ 參考 World Bank (2016)。

⁸ 參考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2017)。

的主要外交與戰略；其最主要的理念乃見諸時任的國務卿希拉蕊 (Hillary Clinton) 於 *Foreign Policy* 所發表之〈美國的太平洋世紀〉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一文 (2011)。歐巴馬總統的任期則是到 2017 年 1 月 20 日結束，因此在 2011 年至 2016 年之間做觀察與分析是屬合理。第二、美國新總統川普 (Donald Trump) 就任至今未滿半年，其完整的亞太外交與戰略布局似乎仍在發展之中。其究竟是否延續或摒棄了「重返亞洲政策」？此猶未定論。因此本文不將川普政府過去數月來的作為納入觀察，而是集中在歐巴馬政府時期的探討。基於以上，本篇論文之開展如下：首先，本文援引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安全困境理論」(The Security Dilemma Theory)，用以解釋為何美國重返亞洲與對亞太進行再平衡是激化中日兩國戰略競爭的邏輯。其次，作者分析中日雙方近年來戰略競爭加劇的原因，特別是彼此在主權與領土爭議上，以及在軍事現代化與軍備擴張方面的相互質疑。再者，本文觀察並分析「美國重返亞洲」因素在中日戰略競爭中所造成的影響。最後，作者歸結以下的結論：華盛頓之「重返亞洲」與「對亞太再平衡」的政策已悄然地促成中日兩國走向更為激烈的戰略競爭。

貳、理論架構：安全困境理論

本文之所以援引安全困境理論做為理論架構，主要理由有二：第一、中日兩國之間的戰略競爭正是符合安全困境理論的邏輯，而加入美國因素之後的圖像 (picture) 亦符合安全困境理論的思維。第二、本文是發想於對柯慶生論文的反思，而其論點則是以安全困境理論為基礎，因此繼續以安全困境理論為架構是屬合理。然而，本文與該篇論文最大的差異是，柯慶生認為，美國軍事力量必須駐

留在東亞，特別是日本，如此將壓制中日兩國安全困境的發生，有助於東亞的安全與穩定。本文則認為，隨著中國崛起，當美國軍力繼續駐留在東亞，並且更加強化與日本的同盟關係，同時支持其調整防衛態勢時，則中日兩國的安全困境將益形惡化，雙方的戰略競爭將更為嚴重。⁹ 準此，本節主要有三項重點：第一、介紹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安全困境理論；第二、說明「安全困境」與「戰略競爭」、「軍備競賽」之間的關係；第三、以安全困境理論為基礎，解釋美國重返亞洲之激化中日兩國戰略競爭的邏輯。

一、安全困境理論

根據 Robert Jervis 的定義，安全困境是「國際關係中的一種情況，當一個國家嘗試藉由許多的方法用以增加自身安全的時候，它同時也在削弱其他國家的安全」(Jervis, 1978: 169)。¹⁰ 換言之，當一個國家致力於提升本國的軍事實力或對外尋求結盟以捍衛它的安全時，它將被其他的國家視為是對該國的威脅。如此，將造成一種反效果——也就是削弱自己的安全 (de Mesquita, 2006: 708)。因為其他的國家也會以相同的方式做回應，而它也會把其他國家的相同作為視為是對自己的一種威脅。

安全困境的邏輯運作可解釋如下：當一個國家 (A 國) 尋求提高其國家之安全保障時，例如內部擴軍或外部結盟，它會令別的國家 (B 國) 感受到威脅，並且降低該國的安全保障。由於 B 國對 A

⁹ Shiping Tang 對「安全困境」與「安全困境理論」做了區別。前者是標示著國際關係中之特殊狀況的一個概念；後者乃是一套尋求理解安全困境之原因、規律與意涵的知識體系 (Tang, 2009: 587)。

¹⁰ 有關安全困境的文獻，可參考 Herz (1950); Jervis (1976, 1978); Montgomery (2006); Tang (2009)。

國的力量增加，一方面感到恐懼 (fears)，二方面充滿了不確定性 (uncertainties)，三方面則是感受到來自 A 國可能的威脅 (threats)，因此 B 國也選擇提高其安全保障以為回應。然而弔詭的是，當 B 國也積極尋求提高其國家安全保障時，它也會令 A 國感受到威脅，並且降低該國的安全保障；而 A 國對 B 國也一樣存有恐懼、不確定性與威脅感。於是乎，對 A 國而言，尋求「提高、增強」其安全保障的過程與結果，其實也是在「降低、減弱」自己的安全保障。另一方面，不論 A 國選擇「增加」、「維持」或「減少」它的防衛力量，根據國際關係理論中現實主義學派的觀點 (特別是攻勢現實主義學派)，A 國的競爭對手 (B 國) 必定會採取增加軍事力量的方式以捍衛其自身的安全。對此，A 國將身陷於不知應該選擇「進」(增加軍備)、「退」(減少軍備) 或「不進也不退」(維持原軍備) 的進退維谷當中 (陳亮智，2009: 93)。而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 B 國。因此，最終來說，不論是 A 國或是 B 國，它們都必須選擇「進」(增加軍備)，因為它們的競爭對手最後仍會選擇增加軍事力量。

安全困境理論之做為現實主義學派中的次理論，其所闡述的「安全困境現象」正好反映了現實主義學派的兩大基本假設：第一、國際體系為「無政府狀態」(anarchy)；第二、國家的性格特質是自私自利 (self-interested)。Kenneth Waltz (1979: 111) 即認為，安全困境的發生主要是來自於國際政治中的兩個本質 (nature)：其一為國際體系是無政府狀態。在此狀態底下，國家必須尋求自助自保；其二為國家的性格是自私自利，也因此國家必須理性地、積極地尋求擴大權力，如此以保護它自身的安全與利益。因此，安全困境的存在與發生是必然的。它會迫使國家不得不做出尋求自保的選擇，整軍經武 (armaments)，因為放棄提升軍事力量無異是向競爭對手束手就擒，而選擇提升軍事力量或有克敵致勝的希望。但是，並非

所有的國家組合都會出現安全困境的現象，若是他們之間不存在著「相互威脅」關係，則安全困境的問題將不易出現（陳亮智，2009: 112）。根據 Stephen Walt (1987: 5-6, 21-26) 對國家間「相互威脅」的觀察，其指標可以包括以下四個面向：集體的力量 (aggregate power)、地理的接近 (geographic proximity)、攻擊性的力量 (offensive power) 與侵略性的意圖 (aggressive intentions)。

雖然安全困境是國際關係中一個自然的現象，然而它的發生卻是一個漫長且可能是曲折的過程 (Tang, 2009: 595)。以冷戰時期的美蘇軍事對抗為例，其前後即進行了約 45 年 (1945-1990)；而當中有一段時間屬於相對緩和的階段 (1968-1977)，其原因乃是美國在越戰中失敗，國內強大的反戰聲音迫使其軍事預算在此期間急遽地減少 (Russett, Starr, & Kinsella, 2007: 231-233)。另外，安全困境的發生也不必然會造成國家落入軍備競賽的「漩渦」(spiral) 當中。以中日關係為例，兩國之間的安全困境確實造成雙方的戰略競爭，但卻未形成彼此的軍備競賽。此外，Shiping Tang (2009: 597) 也認為，安全困境可能會造成若干特定的結果，例如關係惡化、軍備競賽、軍事衝突、戰爭，但並非所有的戰爭都是因為安全困境所造成。

安全困境固然可以從物質因素 (material factors) 來探討，但也必須從心理因素 (psychological factors) 來觀察 (Christensen, 1999: 50; Tang, 2009: 594)。Jervis (1976: 3-10, 54-57) 即認為，一個國家對其所處的國際環境，以及對其他國家的「認知」(perception)，會深刻地影響到它的對外行為，以及與其他國家的互動。當一個國家對所處的外在環境與所互動的國家感到安全時，其發生安全困境的機率相對降低；反之，則發生安全困境的機率相對升高。¹¹ 例如，

¹¹ 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一個國家對所處的外在環境，與另一個國家的認知與判斷，乃是取決於對相關資訊 (information) 的蒐集、分析與解讀。但這又涉及資訊本身的

二十世紀初，英國曾試圖減少其原先所規劃準備建造的戰艦，以減緩其與德國之間的軍備競賽。但經驗顯示，倫敦的善意終究未獲得柏林相對的回應，於是英德兩國最後還是回到安全困境的邏輯 (Montgomery, 2006)。很顯然地，當時英國對德國的認知與實際的結果有一段差距；而英國對德國可能的回應則有所誤解 (misperception) 或誤判 (misjudgment)。再者，安全困境的發生也可歸結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互不信任 (mistrust) 或低度信任 (weak trust)。在互信不足的情況下，一方會恐懼另外一方對自己採取不利的手段，因此國家只好選擇發展武力以保護自身的安全與利益。例如，雖然美、英、日、法、義五國在 1922 年簽訂了華盛頓海軍條約 (The Washington Naval Treaty)，並對簽約國家做出戰艦與戰鬥巡洋艦的總噸位比例規定，但事後發展卻是各國在海軍軍備上的競爭依然如故，其中又以美日兩海軍大國為甚。當時美日雙方的互信基礎極為薄弱——華盛頓不相信東京會就此自我設限其海軍發展；東京則擔心其成為世界海軍霸權的夢想就此會被華盛頓所限縮。於是，在脆弱互信的情況下，美日兩國很快地回到安全困境的邏輯裡，繼續進行軍備競賽。

二、戰略競爭、軍備競賽與安全困境的關連性

根據上述安全困境理論的介紹，在國際無政府狀態的環境中，以及國家自私自利的性格特質下，只要國家之間存在著「相互威脅」的情況，則他們將發生安全困境的問題，因為國家必自保，而自保的最好方法便是向內進行整軍經武，向外尋求締約結盟。而其相對

不確定性 (uncertainty) 與不完全 (incomplete) 問題，如此將造成國家無法精準地研判其競爭對手。因此，安全困境的發生極可能是出自於國家的誤解與誤判 (Jervis, 1978: 169; Montgomery, 2006)。

應的國家也會以同樣的方式做為回應。由於增加軍備是他們最終的作法，也是最好和不得不的選擇，於是在彼此都選擇提升防衛態勢與加強軍備的情況下，相互威脅的國家會產生戰略競爭 (strategic competition)，甚至是軍備競賽 (arms races)。也因此，戰略競爭與軍備競賽可謂是相互威脅的國家之基於安全困境邏輯所造成的結果；戰略競爭或軍備競賽的加劇又會惡化相互威脅國家之間的安全困境問題。然而，證諸本文，中日兩國是在進行戰略競爭，而非軍備競賽。茲說明於以下兩小節當中。

1. 戰略競爭與中日戰略競爭

本文所指稱的「戰略」(strategy) 一詞，乃是根據羅伯特·阿特 (Robert J. Art) 教授對「大戰略」(grand strategy) 的界定而來，係指「一個國家的領導者們清楚地知道他們的目標為何，並且能以最適當的軍事力量來達成該目標」。換言之，大戰略即是「國家尋求處理一個全範圍的目標，但它主要是以軍事手段完成；它是規劃著一個國家如何運用軍事做為工具來實踐國家的外交政策目標」(Art, 2003: 1-2)。阿特進一步歸納指出，規劃與設計國家的大戰略也就是，國家一方面必須思考它的基本利益 (basic interests) 為何，另一方面必須思考如何運用軍事力量以適當地保護該基本利益 (Art, 2003: 2)。¹² 準此，則本文所指稱的「戰略競爭」，乃指國家之間在若干的目標與基本利益上存有相互競爭的關係，而它們主要是以軍事力量為手段，而欲在該目標與基本利益上具有優勢。因此，有關強權

¹² 阿特之所以強調軍事力量的角色，不只是它能夠提供國家實質與具體的保護，同時它也能夠產生「政治效應」，並且發揮「影響力」。然而，阿特也認為軍事並非是唯一的工具，而是必須與政治、經濟、外交與意識型態等方法相互整合，如此以達成最好的結果 (Art, 2003: 4-6)。

之間的戰略競爭，我們可以將之視為是它們彼此以軍事為工具而相互角逐一個共同的利益（目標）；而此目標乃是一個強權要比另一個強權更具有影響力，或是更擁有優勢。基本而言，戰略競爭是一個狀態 (state of being)，也是一個過程 (process)，但並非是國家對外政策的終極目標。國家的最終目標是比競爭對手更具有影響力或優勢，而戰略競爭則是達成該目標（利益）的過程。

很顯然地，當某一強權（A 國）是以提高軍事力量的手段以達成其國家之某項目標或利益時，而此目標或利益又恰為另一強權（B 國）所欲達成或保有，則 A 國的舉動會令 B 國感受到威脅，並且危及 B 國的利益，於是 B 國也會選擇以提高軍事力量的手段回應。當 B 國採取這樣的作為時，其舉動也會令 A 國感受到威脅，並且危及 A 國的利益，於是 A 國必須採取更大的幅度與（或）更大的速度來提高其軍事力量回應，如此以保有比競爭對手更具影響力或優勢。於是雙方便落入安全困境的邏輯當中，而不得不展開激烈的戰略競爭。

在大戰略當中，阿特認為國家及其領導人必須清楚界定屬於該國的「首要國家利益」(overarching national interests)，而保護與維持該利益則是最主要的目標。以美國為例，阿特即勾勒出六項有關美國的首要國家利益，分別是：(1) 預防對美國本土的攻擊；(2) 預防歐亞強權之間爆發戰爭，或出現緊張的安全競爭；(3) 保有獲得合理價格與安全供應的石油；(4) 保有一個開放的國際經濟秩序；(5) 在海外推展民主與人權，並避免在外國的內戰中發生種族屠殺與大規模屠殺；(6) 保護全球的環境，特別是全球暖化與嚴重的氣候變遷問題 (Art, 2003: 7)。¹³ 因此，若一個國家在此六項國家利益

¹³ 在此六項當中，第一項乃為至關重要的 (vital)，第二項與第三項是高度重要的 (highly important)，第四項至第六項為重要的 (important)。

當中與美國發生衝突，並運用軍事手段以獲取影響力或控制優勢，則此一國家遂與美國產生了戰略競爭。準此，若是我們也以這六項首要國家利益來檢視目前的中日關係，則北京與東京之間很顯然地便存有兩項嚴重的利益衝突：第一、不論是中國或日本，雙方都擔心對方在東海，甚或整個東亞，取得軍事上重要的影響力或控制優勢，如此將把自己的領域暴露在對方的威脅之下，嚴重地危害到本國的國家安全，尤其是有關釣魚臺列嶼的主權爭議。此為近似阿特所界定之「對本土的攻擊」，是屬於「至關重要」的利益。第二、對日本而言，東京將嚴重地關切北京是否能掌控東海與南海而影響日本在此兩片水域的航行自由。因為若是如此，則日本的海上石油供輸線將嚴重地受到威脅。此為阿特所界定之「石油的保有與獲得」一項，是屬於「高度重要」的利益。就此而言，北京與東京最有可能在此兩項攸關國家的利益上，因為安全困境的邏輯而展開彼此之間的戰略競爭。

根據以上的討論，不論是「對本土的攻擊」(至關重要的利益)，或是「石油的保有與獲得」(高度重要的利益)，「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 乃是廣泛之國家利益概念的關鍵。¹⁴ 以中日兩國的戰略競爭而言，若是北京掌握了在東海或西太平洋上的軍事優勢，其一將嚴重地挑戰目前由東京所控制的釣魚臺列嶼（況且北京認為該列島為其固有之領土，此乃為日本的「軍事安全」問題）；其二將威脅到日本在東海或西太平洋上之船艦與飛機的航行自由與安全，亦將威

¹⁴ 國家利益是一個極為寬廣的概念，其底下可以包括「國家生存」與「國家發展」兩者。生存是比發展更為基本的概念；生存是發展的前提條件。換言之，有生存，方可論發展；沒有生存，即無發展。而事涉「國家生存」的問題即是有關「國家安全」的問題，其又可區分為軍事安全、經濟安全、人類安全與環境安全等。因此，國家安全（事涉國家生存問題）是廣義之國家利益的次類型。

脅到日本的海上石油供輸線（此乃為日本的「經濟安全」問題）。準此，東京必須極力避免北京擁有如此的軍事優勢。相反地，若是東京掌握了在東海或西太平洋上的軍事優勢，其一將嚴重限制北京收回釣魚臺列嶼的願望，中方將難以維護如其所宣稱之領土與主權的完整（此乃為中國的「國家發展」問題）；其二將嚴重地侷限北京朝向海洋發展的計畫，中方在東海或西太平洋上的開發與經濟利益也將嚴格地受到限制（此乃為中國的「國家發展」問題）。準此，北京亦必須極力避免東京擁有這樣的軍事優勢。¹⁵

2. 軍備競賽與「非」中日軍備競賽¹⁶

除了上述之戰略競爭以外，另一個更為激烈且完全集中在軍事規模與力量上的戰略競爭即為軍備競賽。而軍備競賽發生的邏輯正是符合安全困境理論的解釋；若干研究文獻便指出，安全困境的發生便造成了軍備競賽（Russett, Starr, & Kinsella, 2007: 231-235）。

根據定義，「軍備競賽」係指相互威脅的國家彼此在軍事預算、軍隊規模，以及武器性能方面，展開數量與質量上的競爭（de Mesquita, 2006: 694; Russett, Starr, & Kinsella, 2007: 231-235）。據此，國家間進行軍備競賽的方式主要是集中在：（1）增加軍事預算與開

¹⁵ Richard Bush 即認為，中日雙方皆設法阻止對方能進出或控制重要的戰略區域，然而這些區域卻是高度地重疊（Bush, 2010: 41-42）。而 Christensen (1999: 50) 亦持類似見解。

¹⁶ 本文初稿為發表於 2015 年 12 月 3 日，由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舉辦之「美臺中關係專題研究：2014-2015」學術研討會，原題目為「美國重返亞洲及其在中、日軍備競賽中的角色」。然經論文評論人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郭育仁副教授的指正，本文將原題目之「軍備競賽」改為「戰略競爭」。題目更改的理由如下：根據郭教授的評論，雖然中日雙方對對方之軍備發展存有強烈的質疑，彼此也存有相互競爭的關係，但是在「軍事預算」與「軍隊規模」上，它們並未進行明顯有關數量擴大的競賽，因此中日兩國並無進行軍備競賽。

銷；(2) 增加軍隊的規模與數量 (包含人員及武器)；(3) 提升武器裝備的質量等三項。歷史上軍備競賽的著名例子，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英國與德國，以及冷戰時期的美國與蘇聯。軍備競賽之所以發生的邏輯是可以被安全困境理論解釋如下：因為某一強權 (A 國) 對其安全增加的尋求，同時也是對該國安全減少的形成，其關鍵是該國的安全增加 (軍備擴張) 會造成另一強權 (B 國) 的安全減少，由於不安全感與遭受威脅，他國亦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 (軍備擴張)，以反制該國所形成的安全威脅。而 A 國為反制 B 國的反制，必須採取更大幅度與 (或) 更大速度的軍備擴張以為回應，同樣的道理亦適用在 B 國身上。於是雙方便陷入不斷的軍備擴張與競賽之中 (Jervis, 1976, 1978: 167-170)。

根據上述軍備競賽的定義，本文所觀察的中日兩國並無發生明顯的軍備競賽，因此本文不以軍備競賽稱之。理由有二：首先，在軍事預算開銷上，一則是日本的軍事開銷成長速度不若中國之快；二則是中國的軍事開銷在 2000 年至 2015 年的 16 年間一直保持穩定的成長，而日本卻在 2011 年至 2015 年的 5 年間呈現下滑的趨勢 (參照本文第三節第二項)。其次，在軍隊規模與數量上，根據外國軍事網站全球軍力 (Global Firepower; GFP) 的統計顯示，不論是在常備兵力人數、可動員人數或陸軍、海軍、空軍等各式武力的數量上，中日雙方的實力仍存有一段差距。¹⁷ 但是，北京與東京確實在以下三個面向上出現競爭的態勢：第一、雙方都各自積極地在武器系統上進行現代化與再升級，它們的目標是要比對方擁有更為優勢的軍事力量。第二、中方在東海劃設防空識別區，並且將範圍涵蓋了釣魚臺列嶼；日方則以「軍事搭配政治與外交」為手段，藉由美國

¹⁷ 有關中日兩國軍力的比較，參照 Global Firepower (2016)。

承認其對釣魚臺列嶼的管轄權（政治與外交），並強調美日安保條約乃適用於保護該群島（軍事），如此以反制中方對該領域的聲索、主張與行動。第三、日方採取安全政策調整，包括：解除對集體自衛權的限制與通過新安保法案，以更積極主動的防衛態勢回應中方的軍事擴張與潛在威脅。如此，雙方確實正在進行戰略競爭。

根據上述第一、二小節的討論，本文必須指出，雖然戰略競爭與軍備競賽兩者的背後同樣是以安全困境的邏輯為基礎，同時兩者也都包含「恐懼」、「不確定性」、「威脅」、「軍事」、「安全」與「競爭」的元素在其中，但是他們並不是相同的概念與現象。當我們細究個中的定義與內容時，戰略競爭與軍備競賽兩者乃存有一個極大的差異——前者是較為寬廣的，後者則是較為狹小的。換言之，軍備競賽是廣義戰略競爭中的一個「子集合」(subset)。當相互威脅的國家發生戰略競爭時，他們未必會進行軍備競賽（當前中國與日本）；但是，當相互威脅的國家發生軍備競賽時，他們也是在進行戰略競爭，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英國與德國，以及冷戰時期的美國與蘇聯。此外，兩者另一個極為明顯的差別是，戰略競爭雖稱是「以軍事力量做為手段」，但其並無清楚而具體的內容。其方式可以包括：(1) 增加軍事預算與開銷；(2) 增加軍隊的規模與數量（包含人員及武器）；(3) 提升武器裝備的質量；(4) 對某一特定爭議問題採取「軍事搭配政治與外交」的回應；(5) 對潛在競爭者的軍事發展提出質疑，並適時地調整安全政策；以及 (6) 發展太空科技（類似冷戰時期的美蘇太空競賽）等。相對地，軍備競賽則是明確地集中在軍事手段上，主要是集中在 (1) 增加軍事預算與開銷；(2) 增加軍隊的規模與數量（包含人員及武器）；以及 (3) 提升武器裝備的質量等三項。準此，中日兩國確實是在進行戰略競爭，而非軍備競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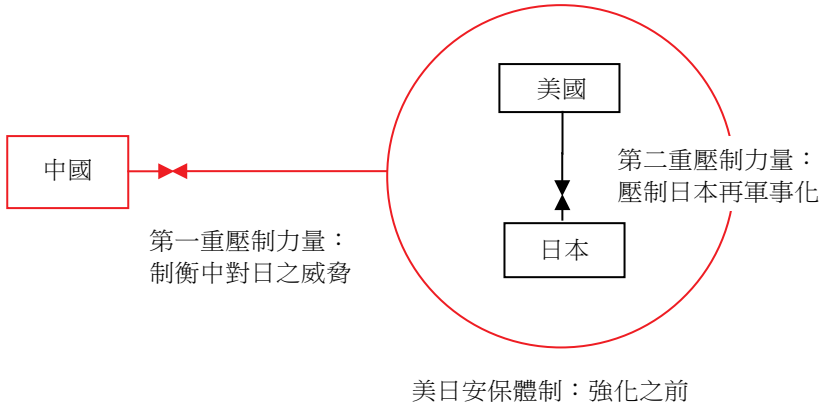
三、美國重返亞洲對中日戰略競爭之影響的安全困境邏輯

針對美國重返亞洲對中日戰略競爭的影響，不論是在之前或之後，安全困境理論皆可做為解釋該現象的理論基礎。首先，在華盛頓尚未採取重返亞洲與亞洲再平衡策略之前，北京與東京之間的安全困境問題原本就已存在。中日雙方不僅都關注東亞的權力分布狀態，同時也都在乎誰對此水域與空域具有更強的投射能力。另外，因歷史因素所造成的互不信任與相互敵意，以及對臺灣問題不同的看法，只要其中一方對另一方造成威脅，或是讓對方感受到威脅，另一方必然採取反制措施。不論是中國應對日本或日本應對中國，雙方的思維與邏輯是一致的，東亞區域的緊張情勢將因此升高，致使安全環境陷入危險 (Christensen, 1999: 50)，例如中方即擔心日方戰區飛彈防禦系統的部署、軍費分攤的提高，以及海外派兵的實施；日方則擔心中方之發展軍事現代化、對臺灣進行統一，以及在南海擴張勢力範圍。為了克服此一問題，並減少雙方發生軍事衝突，甚或是戰爭的可能性，美國軍事力量必須常駐在東亞，特別是日本，用以壓制中日兩國安全困境的發生，防止兩國關係走向惡化，進而穩定東亞的安全 (Brooks, Ikenberry, & Wohlforth, 2012/2013: 38-39; Christensen, 1999; Mastanduno, 2002: 196-201; Mearsheimer, 2011: 33; Shirk, 2007: 262; Sutter, 2006: 63-65)。而美國軍力的駐守與美日軍事同盟便是以雙重壓制的力量來遏止中日安全困境，包括透過美日同盟以制衡中國對日本的安全威脅 (第一重壓制力量)，以及反對日本的再軍事化以避免日本對中國造成刺激與威脅 (第二重壓制力量)(參照圖 1)。換言之，就華盛頓的角色來說，它是北京與東京之間的「平衡者」(balancer)，發揮著「平衡」(balancing) 的作用——當美國覺得中國與日本之間的衝突太過於激烈，而有可能

導致軍事危機或戰爭，進而把美國捲入的時候，它就會對任何做出挑戰與刺激的一方予以壓制，不論是中國或日本，如此以緩和兩國之間的緊張關係。¹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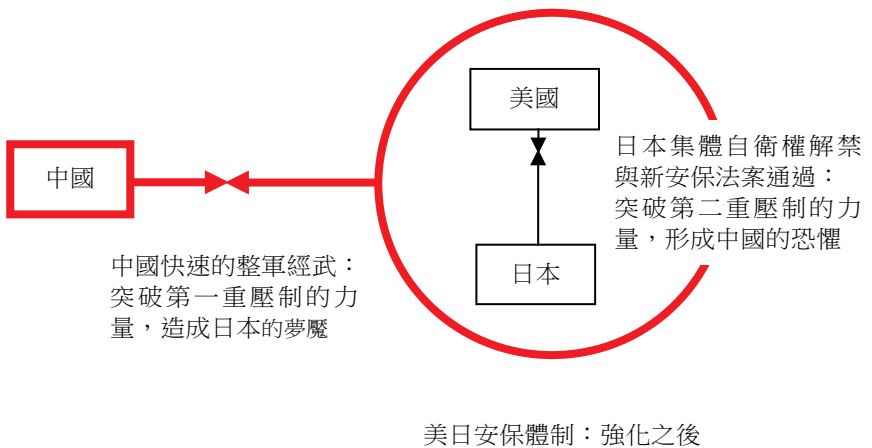
然而，在華盛頓重返亞洲之後，北京與東京之間的安全困境問題卻隨著中國總體國力的日漸增強，以及美日同盟關係的益趨強化而惡化，雙方的戰略競爭也更為嚴重（參照圖 2）。當中的邏輯解釋如下：首先，為了回應國力迅速攀升的中國，以及解放軍頻繁地進出東亞海域與穿越第一島鏈（第一重壓制力量被突破，並形成日本的夢魘），美國開始推動重返亞洲與再平衡策略以制衡中國的武力擴張，尤其是加強它與日本的軍事同盟關係。然而，當華盛頓與東京加強軍事合作時，包括：美日聯合軍事演習，協助日本提升武器性能，承認日本對釣魚臺列嶼／尖閣諸島的管轄權，強調該群島受到美日安保條約的保護，支持日本集體自衛權的解禁，以及支持日本新安保法案的通過等等，這些作為都帶給中國許多的不確定性與不安全感（第二重壓制力量被突破，並造成中國的恐懼）。於是北京必須更加發展其力量以突破美日兩國對它的牽制，包括：發展航母與潛艇，經常性地在東海、臺海與南海進行海空巡弋、舉行軍事演習、劃設航空識別區，以及在南海進行填島造陸並軍事化等等，如此以對美日兩國形成反制的作用。對此，華盛頓與東京必須採取更進一步的反制措施，於是雙方則回到典型的安全困境邏輯當中。本文認為，安全困境的邏輯之所以在中日戰略競爭當中被重新啟動，關鍵因素有二：第一、中國快速地進行軍事現代化與軍備擴張，如

¹⁸ Kenneth B. Pyle (2007: 336) 即指出，柯林頓政府就明顯地對北京友善，而對東京冷落；小布希政府則是對北京有所敵意，而與東京親近。Mastanduno (2002: 197) 亦持此一「平衡」的觀點。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圖 1 美國重返亞洲之前的中日戰略競爭：受壓制的中日安全困境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圖 2 美國重返亞洲之後的中日戰略競爭：被激化的中日安全困境

此成為日本的夢魘。第二、東京調整其防衛態勢，轉為更積極、主動與全面，如此造成中國的恐懼。也因為如此，長久以來被視為是最具有抑制中日發生軍事衝突的美日安保體制，一方面在中國不斷地走向遠洋發展，另一方面在美日同盟更為強化之際，華盛頓的作為正在激化北京與東京之間的戰略競爭。

參、中日戰略競爭的原因

在美國重返亞洲之前，中國與日本即存有安全困境的問題，並進行著若干的戰略競爭。造成此一情況的因素來自存在已久的歷史遺緒，包括「歷史恩怨情仇」和「民族主義情感」，以及近年來雙方對彼此在外交、軍事與戰略發展上的相互質疑。中日雙方並非只是在狹隘的「武器系統提升」上進行競爭而已，他們更在「釣魚臺列嶼主權爭議」上競爭，同時對對方的軍事發展與現代化提出強烈的質疑。中日關係推進的困難，一方面既是舊問題融合著新問題，另一方面也是新問題延續著舊問題。

一、舊問題：遲遲未能克服的歷史遺緒問題

根據柯慶生的分析，中國對日本「國家正常化」與「再軍事化」的恐懼與害怕來自於歷史的經驗，也就是兩次中日戰爭：1894年至1895年的甲午戰爭與1937年至1945年的中日戰爭 (Christensen, 1999: 52-55)，這兩次戰爭嚴重造成中日雙方難以彌補的裂痕。縱使時空環境已經改變，日本也已成了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北京依然害怕一個（再次）更為強大的東京。一樣地，由於中國的崛起，伴隨著北京日益強大的經濟與軍事實力，日本也擔心一個強大的中國會對日本的安全與利益構成嚴重威脅 (Pyle, 2007: 310-313; Samuels,

2007: 136-143; Taniguchi, 2012: 182-200)。事實上，有關中日戰略競爭的根本原因，一個重要的關鍵便是雙方遲遲未能克服的歷史遺緒問題。雙方主要的爭執點包括有：(1) 日本中、小學歷史教科書應該如何正確地描述侵華戰爭與太平洋戰爭問題；(2) 日本政治領袖如何對侵華戰爭與太平洋戰爭做出具體的道歉與永不再犯的承諾；(3) 日本如何看待南京大屠殺問題；(4) 日本如何看待慰安婦問題；(5) 日本如何看待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以及 (6) 日本如何看待釣魚臺列嶼主權爭議問題。戰後中方即不斷重複地要求日方必須審慎、嚴肅、正確地正視上述問題，並對過去歷史做出準確的描述，誠懇的道歉，以及永不再犯的承諾。另外，中方亦要求日方的政治菁英不應該再參拜供奉有二次大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然而針對中方的要求，日方的回應始終無法滿足中方的期待。例如：日本並未對侵華戰爭歷史做出完整、準確的敘述與反省；對發動戰爭雖有所致歉（村山談話），但顯現得不夠直接與坦然；對參拜靖國神社問題則未做出具體且永遠的承諾。此外，在「民族主義」與「民族情感」上，中國一方多以抗日民族主義而強烈地批判日本對中國的不友善作為；日本一方亦以仇中民族主義之鼓吹以喚醒國家民族的憂患意識，以防範中國的逆襲。在此脈絡下，為尋求中日雙方的信任與和解無非是難上加難。本文認為，中日兩國在這些問題上的糾結，非但影響雙方的相互信任，同時也造成對彼此的誤解，此非但無助於化解兩國的戰略競爭，反而使之更為惡化。

因為上述歷史遺緒問題，以及對彼此的互不信任，中日之間只要有任何關於戰略的行動，特別是軍事上的作為，則他們都會對對方表示質疑與不安。依照安全困境理論的解釋，從中國的角度而言，因為對東京的不信任與恐懼，當日本推動「國家正常化」、「尖閣諸島購買」、「集體自衛權解禁」與「新安保法案通過」等作為時，

北京會視這些作為都是日本的「再軍事化」，其目的便是要牽制中國走向遠洋的發展，讓日本在東亞地區取得地緣政治上的優勢。以「尖閣諸島之購買」為例，日方的作為確實嚴重地侵犯了中國所謂的核心利益——主權與領土的統一完整。至於其他「集體自衛權解禁」與「新安保法案通過」兩項，雖說東京表示是為了自己的國家安全所做的規劃，非特別針對某單一國家而定。但就北京而言，日本尋求國防軍事的正常化與自主性雖非準備「再一次侵略中國」，但其對中國的海洋發展確實會構成相當程度的影響與限制。於是中方必須質疑日方的作為，同時做出相對應的反制措施。相對地，從日本的角度來說，其最質疑且最擔心的便是中國的軍事現代化，以及中國經略遠洋的企圖。東京擔心，中國海軍實力的提升將會衝擊到日本的利益，特別是雙方在釣魚臺列嶼的主權歸屬上有所爭議。¹⁹ 因為歷史遺緒與民族主義情感的關係，東京理當自知其成為中國海軍之假想敵的機率很高；又因為美日同盟的關係，日本亦是無法自外於北京與華盛頓之間的戰略競爭（蔡增家，2012）。

二、新問題之一：武器系統發展上的競爭

根據軍備競賽的定義，再以中日雙方的軍事開銷與軍隊規模來看，我們難以界定兩國正在進行軍備競賽（參照本文第二節第二項之二）。但是，細究雙方軍事現代化的作為時，特別是他們所購置與發展的武器系統，則不難發現雙方其實都在防範著對方，並且希望在東亞地緣政治上擁有比對方更大的影響力與更優越的控制權。

首先，就軍事開銷的總額來說，從圖 3 可以看出，美國依舊是

¹⁹ 當然，中國的目標也是指向美國。因為美日同盟的關係，美日雙方在東海的利益上有高度的重疊性—指向日本即指向美國，指向美國即指向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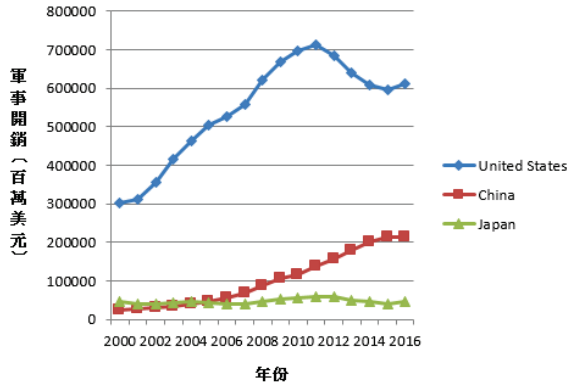


圖 3 數據整理自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中的 Data for all countries 1949-2016 (excel spreadsheet)，以現有美金為基準 (SIPRI, 2017)。

美、中、日三國當中最大的國家，其遠遠超過中日兩國。但是就軍事開銷成長來說，中國卻是三者當中成長最為明顯的國家，其成長倍數遠超過美日兩國。在 2000 年至 2016 年的 16 年當中，美國的國防支出從 2000 年的 3016.97 億美元升高到 2016 年的 6111.86 億美元，16 年後成長為 16 年前的 2.03 倍；中國的國防支出從 2000 年的 229.30 億美元升高到 2016 年的 2151.76 億美元，16 年後成長為 16 年前的 9.38 倍；日本的國防支出從 2000 年的 455.10 億美元升高到 2016 年的 461.26 億美元，16 年後成長為 16 年前的 1.01 倍。²⁰ 準此，中日兩國之間確實並無存在著軍備競賽的問題，因為一則是日本的軍事開銷成長速度不若中國（日：中=1.01：9.38）；二則是中國的軍事開銷在 2000 年至 2015 年的 16 年間始終保持穩

²⁰ 參考 SIPRI (2017)，主要根據 Data for all countries 1949-2016 (excel spreadsheet)，以現有的美金為基準。

定成長，日本卻在 2011 年至 2015 年的 5 年之間呈現下滑趨勢。相似情況也發生在美中兩國之間，根據數據顯示，我們也難以推論美中兩國之間存有軍備競賽現象，其一是美國的軍事開銷成長速度遠不若中國（美：中=2.03：9.38）；二則縱使美國的軍事開銷成長速度遠不及中國，但是美國在國防軍事上的花費卻遠遠地超過中國；三則是美國的軍事開銷在 2011 年至 2015 年的 5 年之間呈現下滑的趨勢，但中國在 2000 年至 2015 年的 16 年間始終保持穩定成長。

雖說日本的軍事開銷總額不若美國與中國兩者，且它在 2000 年至 2015 年之間的軍事支出亦無明顯的起伏變化（年平均維持在 468.03 億美元左右）。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始終都是亞洲各國中，投注在軍事預算上的第一名國家（2000-2003）與第二名國家（2005 年迄今，2005 年後為中國超越）。而它對第三名的印度，則始終保有一段差距的領先（2000-2015，印度的年平均軍事開銷為 324.83 億美元）。因此日本雖然沒有跟著絕大多數的亞洲國家（尤其是中國）一起升高它的軍事開銷，但它仍是亞洲國家中進行軍事現代化的重要一員，且是第二大的軍事支出國家（陳亮智，2011：46）。

當我們細究中日兩國的軍事採購與軍備擴充時，本文發現，雙方依然在軍事力量的各種面向上進行競爭；兩國都積極地在軍事武力上進行現代化與再升級。他們的目標即是要保持相對優越的影響力與控制權，以因應對方可能造成的威脅。首先，在武器輸入方面，根據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The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2014 年國際武器輸出與輸入趨勢〉（“Trends in International Arms Transfers, 2014”）報告指出，日本於 2013 年已計畫向美國購買最先進的 F-35 戰機；2009 年至 2013 年間亦向美國購置長程飛彈防禦系統。該報告亦指出，中日雙方均持續建造由各自親自設計的潛艦，正如同其他許多亞洲國家一樣，兩

國似乎正陷入競相追逐建立潛艇艦隊的風潮之中 (SIPRI, 2014: 2)。2016年8月,新就任的日本防衛大臣稻田朋美 (Tomomi Inada) 更向日本國會提出日本史上最高的國防預算,用以購買諸多的新式武器,包括6架最新式的F-35隱形戰鬥機,5架V-22魚鷹式傾轉旋翼 (Osprey tilt-rotor) 飛機,6架奇努克 (Chinook) 直升機,兩棲攻擊艦,以及地對艦與空對艦飛彈系統等等 (Parry, 2016)。在中國方面,解放軍海軍目前擁有規模超過300艘的水面船艦、潛水艇、兩棲作戰艦艇,以及海岸巡邏艦艇等等,是亞洲擁有艦艇數量最多的國家。2012年9月,遼寧號航空母艦已正式下水成軍,目前則正在建造中國首艘的自製航空母艦001A型號,並已於2017年4月26日下水。而在航空母艦的空中武力部分,目前的主力是殲15戰機,其部署確實大幅提升了中國海軍的遠程投射能力,而殲20與殲31戰機也陸續在研發當中。在潛艦的發展方面,中國海軍目前約有68艘潛艇,包括5艘核子攻擊潛艇與4艘彈道飛彈攻擊潛艇。另外,配合航空母艦與潛艇的發展,解放軍目前亦部署了射程超過1,500公里的東風21D型反艦彈道導彈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6)。總體來說,北京在軍事現代化上的數量與質量都在快速提升中,此一發展確實對東京與華盛頓造成嚴重的挑戰。

其次,在武器輸出方面,中國明顯地比日本更具有優勢。根據〈2015年國際武器輸出與輸入趨勢〉(“Trends in International Arms Transfers, 2015”)的報告,一方面,中國是在美國與俄羅斯之後,排名世界第三大的武器輸出國家;二方面,在2006年至2010年與2011年至2015年當中,中國的主要武器出口增加了88% (主要輸出的地區是亞洲及大洋洲);同時段中國占全球武器輸出的比例則增加了2.3% (從3.6%增加至5.9%) (SIPRI, 2015: 3)。事實上,軍事武器的輸出與國家自身的科技與國防實力是有顯著的正相關。2013年

版的〈國際武器輸出與輸入趨勢〉報告便指出，有關中國的武力擴張是可以被中國快速的軍事科技發展所解釋的 (SIPRI, 2014: 3)。而迅速的軍事科技發展、快速且大量的武器輸出與軍事擴張三者又是環環相扣。相較於中國，日本因為礙於 1967 年以來「武器出口三原則」的自我限制，東京在此方面的表現是遠不及北京。²¹ 但是，此一情況則在第二次的安倍晉三政府 (2012 年 9 月迄今) 出現了改變。2014 年 4 月 1 日，日本內閣通過「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即禁止出口原則、允許出口原則，以及轉移第三國原則，同意在有條件情形下，讓日本所生產的武器開始輸出到國外 (郭育仁, 2014a)。不久之後，日本重要的軍事工業集團 (例如：三菱重工) 即開始與美國、英國、澳洲與法國等國家接觸，計畫進行軍事科技方面的輸出、轉移與合作。當然，此舉則引來中國極度的不悅——中國外交部數度對日本在武器輸出上的鬆綁表達嚴重的擔憂，並表示日本的作法將嚴重地衝擊到東亞的區域安全環境 (Pollmann, 2015)。準此，若是我們把中日兩國近年來的關係連結到雙方的歷史遺緒與互不信任時，則兩國發生戰略競爭是屬合理，同時也符合安全困境理論的邏輯。

三、新問題之二：釣魚臺列嶼主權爭議

中日兩國除了在武器系統升級上競爭外，雙方在釣魚臺列嶼主權爭議上亦存有嚴重的歧見；而此爭議看似是新問題，實則是一個舊問題。如果歷史遺緒問題是禁錮著中日關係的一個死結，那麼釣魚臺列嶼主權爭議問題則是另一個侷限中日關係發展的枷鎖。就此

²¹ 即日本所生產的武器 (1) 不銷往共產國家；(2) 不銷往聯合國決議武器禁運的國家；以及 (3) 不銷往爭端當事國以及可能的爭端國家等三原則，但後來演變為全面禁止。

而言，北京與東京非但在言語文字上爭鋒相對，在實際行動上，不論是官方或民間，雙方也頻頻出現摩擦衝突；兩國在此議題上的爭論不休，標示著此一問題的懸宕無解。對日本而言，為維持它對該群島的實質管轄與控制，其必須保有相對的軍事優勢與影響力；對中國來說，為影響或取代日本對該群島的實質管轄與控制，亦必須保有相對的軍事優勢與影響力。於是，兩國遂自然地發生戰略競爭。

從東京的角度看中國，若北京的力量想要投射到更遠的西太平洋區域，則擁有或掌握東亞諸島，並且突破第一島鏈，此乃為它的戰略目標，臺灣如此，釣魚臺列嶼亦然。對北京來說，釣魚臺列嶼非但有其「固有歷史疆域」的神聖意義，其周邊海域所蘊含的豐富海洋資源與經濟利益，以及它所具備之地緣政治上的戰略價值等，都促成中方對該群島之主權所有的堅持。由於中國目前無法實質對釣魚臺列嶼進行控制與管轄，因此不斷宣稱對該島擁有主權遂成為北京最重要的政治動作。此外，中國也以國家政府的立場不斷向日本抗議，默許民間船隻不定時地衝破日方封鎖以圖登島，派遣人民解放軍海軍巡弋於東海，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以及夥同俄羅斯艦隊於東海區域舉行聯合軍事演習等等。很顯然，這些發言與動作都是針對日本（與美國）而來，藉此不斷地給予東京施加壓力。

另一方面，對東京而言，釣魚臺列嶼具有以下幾項重要意義：第一、該列嶼諸島是日本「既存與現有控制的領域」，是其領土與主權完整的一部分。雖然美國不承認中日任何一方具有對該列嶼諸島的「主權」(sovereignty)，但是美國則承認日本對該列嶼諸島的「管轄權」(jurisdiction)，並且認為是美日安保條約的適用範圍。²² 第二、列嶼諸島周邊的海域所蘊含豐富的海洋資源與經濟利益對日本具

²² 美國總統歐巴馬於 2014 年 4 月訪問日本時即明確指出，釣魚臺是日本施政下的領域，適用美日安全保障條約第 5 條（楊明珠，2014a；Christensen, 2015: 261）。

有重要的經濟價值。第三、擁有並且控制該列嶼諸島具有重要之地緣政治上的戰略價值，因為失去該列嶼諸島，則日本的國家安全將嚴重暴露在北京的軍事威脅之下。第四、該列嶼諸島對日本的經濟命脈極為重要，因為它位處在東海海域上，就在日本的石油海上運輸航線附近。正如同日本也非常重視美中兩國在南海的爭執一樣，因為南海海域上的運輸水道安全和東海同等的重要。若是北京能夠同時控制，或強烈地干預、影響東海與南海，或只要控制，或強烈地干預、影響其中一個海域，則日本的經濟將受到嚴重的威脅（經濟安全）。依前述中日雙方薄弱的互信基礎，任何一次有關釣魚臺列嶼的主權爭議與衝突，都是反應兩國之所以進行戰略競爭的本質，也因此雙方皆不會輕易地在此一議題上向對方退讓。

四、新問題之三：中方的軍事透明化與藍水海軍發展 vs. 日方的國家正常化、集體自衛權解禁與新安 保法通過

有關中日兩國近年來的戰略競爭問題，一個重要的發展是，兩國對對方在軍事態勢上的調整與改變皆抱持著嚴重的質疑——日本強烈地質疑中方的「軍事透明化」與「藍水海軍發展」；中國則強烈地質疑日方的「國家正常化」、「集體自衛權解禁」與「新安保法通過」。

首先，在面對中國軍事透明化與藍水海軍發展的問題，東京認為北京的軍事現代化發展，不論在國防預算、武器研發或目標企圖都是隱晦不明的，日本強烈質疑中國發展其軍事力量的企圖。根據日本防衛省 2013 年公布的〈防衛計畫大綱〉（“National Defense Program Guideline for FY 2014 and beyond”）（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2013），日本便直指中國持續且大幅地增加國防預算，其軍事日地並

不明朗，軍事透明度極低。另外，中國也在東海與南海兩個海域保有強大的軍事活動能量，持續侵犯日本的領海與領空。而且，中國又擅自劃定「東海防空識別區」，如此已妨礙了公海上之水域與空中航行、飛航自由，這些作為都讓日本與其他國家感到擔憂（郭育仁，2014b: 1; 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2013: 3-4）。同樣地，在《2016年防衛白皮書》(Defense of Japan 2016) 第一章第三節當中，日本防衛省則完整描述了中國所處的情況，及其對日本安全環境的影響。大致上與〈防衛計畫大綱〉所分析的情形類似，日本對中國國防預算的快速增加，以及各式軍事力量的迅速提升，充滿了質疑與擔憂。其中該報告也分析了北京在東海與南海上是具有強烈的企圖心；其經常性地入侵、干擾日本的領海與領空，一定程度地危及到日本（與美國）的利益與安全。日本認為，中國其實並未真正地表明它在軍事發展上的狀況與企圖（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2016a）。

其次，在日本進行「國家正常化」、「集體自衛權解禁」與「新安保法通過」的作為上，中國認為，東京之尋求軍事力量自限的鬆綁會帶給北京極大的不安全感，而這些作為正是日本再軍事化的重要步驟。2014年7月1日，日本內閣會議決定修改憲法解釋以解除對日本集體自衛權的限制。該決議認為，縱使國家本身未受到攻擊，日本也可為了阻止針對他國的攻擊行為而行使武力。旋即中國外交部便做出了反應——中方反對日方刻意製造所謂的「中國威脅論」，用以推動其國內的政治議程，同時敦促日方尊重其鄰國對安全的正當關切，不得損害中國的主權和安全利益，也不能危害區域的和平穩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4；李文，2014）。2015年5月，中國國防部公布了中國軍事戰略白皮書，其中揭示中國的軍隊主要是在捍衛和平發展，並且創造合作共贏的戰略機會，同時堅決反對

任何形式的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中國也認為，其安全環境之主要威脅有：(1) 美國持續的「再平衡」戰略；(2) 日本大幅調整的軍事安全政策；(3) 鄰國與中國在領土與領海上的主權爭議；(4) 區域外國家的插手干預；(5) 朝鮮半島問題、臺灣海峽問題與地區的恐怖主義與分裂主義等議題。該戰略報告亦明白揭櫫，中國的國防是基於「積極防禦」的戰略指導方針，在作法上採取資訊公開與透明方式，以讓其他國家瞭解中國的軍事現代化與軍力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5；Jacobs, 2015a）。2015年9月19日，日本參議院通過新安保法案，並規定日本可以派兵支援盟邦。對此，中國外交部則回應日本的「加緊強化軍事力量，大幅調整軍事安全政策，與和平、發展、合作的時代潮流格格不入」。中國強烈質疑日本「是否要放棄專守防衛政策和戰後所走和平發展道路」，同時呼籲「日本應切實汲取歷史教訓」（蔡曉穎，2015）。

對北京來說，東京尋求「國家正常化」、「集體自衛權解禁」與「新安保法通過」的作為究竟只是單純為了捍衛國家安全？或另有投射其軍事力量到更遠的國際領域？甚至是有意攻擊與侵犯其他國家？若是，這個其他國家會是哪一個國家？當日本將其軍力投射至東海，甚至是南海時，²³ 必定會帶給中國極大的威脅感，此當不會為北京所喜。準此，東京在這三項議題上的突破，非但會引起北京極大的不安與質疑，更將惡化中日兩國之間的安全困境問題，加速雙方走向更為嚴重的戰略競爭。當然，本文也必須指出，東京在「國家正常化」、「集體自衛權解禁」與「新安保法通過」上的努力，事實上也是受到中國崛起的影響，而不得不採取更積極與更強硬的「新現實主義式」（new and more realist）的姿態（Auslin, 2016；

²³ 當美中兩國在南海主權爭議針鋒相對的時候，東京曾嘗試尋求與華盛頓一起巡弋南海，並在該海域舉行美日聯合軍事演習（Brunnstrom, 2016）。

Campbell, 2016: 208-210)。因此，不可避免地，中日兩國將因安全困境的邏輯而加速進行彼此的戰略競爭。

肆、美國重返亞洲對中日戰略競爭的影響：激化作用

為了因應中國的崛起及北京積極尋求突破第一島鏈的企圖，美國於 2009 年 7 月開始，由時任國務卿的希拉蕊在東協區域論壇上宣布：美國的力量將重返亞洲。²⁴ 隨後，華盛頓即展開一系列提升其與亞太地區同盟國家的軍事交流與合作。而在美日軍事同盟上，從 2010 年 12 月以來，華盛頓與東京便不斷地舉行雙邊聯合軍事演習，同時也積極地促成日韓兩國進行軍事交流合作。而在美國重返亞洲之下，華盛頓鼓動、激化了北京與東京走向更為激烈的戰略競爭態勢。茲就中日兩國的歷史遺緒問題與日本的軍事合作與交流，以及對日本防衛政策重新定位的態度等三個面向，檢視美國對中日戰略競爭的影響。

一、美國在中日兩國歷史遺緒問題上的態度

在中日兩強的戰略競爭中，美國清楚地選擇與日本同一陣線；華盛頓非但支持東京採取更積極的軍事安全政策，更加強美日聯合軍事演習，並協助提供武器系統更新。然而，在兩國歷史遺緒的衝突爭議上，我們則無法清楚地看出美國的態度。例如：在日本歷史教科書、對二戰的道歉與不犯承諾、南京大屠殺與慰安婦等問題上，

²⁴ 2011 年 10 月，國務卿希拉蕊更於《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雜誌上發表題為〈美國的太平洋世紀〉(“America’s Pacific Century”)一文，對美國重返亞太的決心與政策做出完整的論述。關於美國重返亞洲的政策宣示與新聞報導，參考 Calmes (2011); Clinton (2011);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0)。

美國政府並未強迫日本做出符合中國（與其他亞洲國家）的期待或要求。但是，在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上，美國並非一味地袒護日本，其對日本也有所警告與批評。例如：當日本現任首相安倍晉三於2013年12月參拜靖國神社時，華盛頓除表示失望之外，亦認為安倍之舉只是基於民族主義的展現，希望日本政府下不為例，同時也敦促日本改善與鄰國的關係（劉屏，2014; Christensen, 2015: 265）。

但是，在「釣魚臺列嶼主權爭議」上（此亦為中日雙方的歷史遺緒問題），美國確實是採取強化美日關係，以對抗中國軍事擴張可能形成的威脅。雖然美國呼籲中日雙方對此爭論應該保持冷靜，但它承認東京對該列嶼諸島之管轄權，並且認為是美日安保條約的適用範圍（Christensen, 2015: 261）。就此而論，傳統上被認為是最具有穩定東亞安全秩序的力量，最具有遏止兩國發生安全困境與軍事衝突的美日安保體制，如今在華盛頓尋求強化與日本的軍事合作，並鼓勵日本重新定位其安全政策之際，美國正快速地激化中日兩國進行戰略競爭。

針對中日兩國的歷史遺緒問題，Kurt Campbell對美國應該採取什麼立場提出一個很好的建議。Campbell (2016: 210-211) 認為，採取「雙重壓制力量」的方式，以降低日本與中國，以及南韓及其他在二戰期間受到日本侵略的國家在歷史問題上的衝突，進而讓他們修好。一方面，美國應該努力減弱中國與南韓的反日情緒；二方面，美國應該努力促成日本政治菁英修正其對侵略戰爭的歷史觀，特別是到靖國神社參拜。畢竟，如果東京要在經濟、政治外交與軍事上成為真正的大國，其必須努力營造與亞洲鄰國的良好關係。而其中一個重要關鍵，即是在這些歷史問題上採取誠懇的反省與面對。Campbell的立意甚佳，但從經驗上來看，雖然美國在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上做了表態，但是在日本歷史教科書、對二戰的道歉與不犯承

諾、南京大屠殺與慰安婦等問題上，美國並未採取一個明確的態度以強迫日本向中國與其他鄰國讓步妥協。而在釣魚臺列嶼主權爭議問題上，由於該問題涉及華盛頓與東京兩者共同的實質利益——地緣政治上的安全與戰略重要性，因此美國採取支持日本的立場。雖然華盛頓並無明確地承認哪一個國家對該列嶼諸島擁有主權，但是美國承認日本對其的管轄權，且它是美日安保條約的適用對象。

二、美國加強與日本軍事合作：聯合軍演與武器購買

美國重返亞洲之所以激化中日兩國的戰略競爭，其中一個重要的關鍵就是美國加強與同盟國日本的軍事合作與交流。依照安全困境理論的邏輯，此作為會帶給中國不確定性與不安全感，因此北京必須更加發展其力量以反制美日對它的牽制作用。而美日的軍事合作與交流可分別從「美日聯合軍事演習」與「美國對日本武器購買的協助」兩個面向來進行觀察。

1. 美國加強與日本的聯合軍演

為了因應中國崛起及其可能造成的軍事威脅，美日兩國尋求強化彼此同盟關係，而其中一項便是加強雙邊聯合軍事演習。在美國方面，2015年的〈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便指出，美國會推進它的亞太再平衡政策；會密切注意中國的軍事現代化與擴張；也會強化與軍事同盟國的關係，以因應區域與全球的挑戰(White House, 2015: 24-25)。2016年，美國國防部在向國會所做的有關〈中國軍事與安全發展報告書〉(“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6”)便指出，美國對中政策是根據其與亞洲夥伴國家的共同利益而建立(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6: iii)。在

日本方面，2015 年修訂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The Guidelines for U.S.-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 便強調，日本自衛隊與美軍將持續地在日本內、外部，進行雙邊與多邊的聯合軍演 (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2015)。2016 年的《防衛白皮書》(*Defense of Japan 2016*) 則指出，從 1985 年以來，美日兩國便十分強調他們的雙邊聯合軍演——它不僅能強化兩方的共同反應能力，同時也能提升各自的戰術能力 (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2016b)。²⁵

事實上，在美國宣布重返亞洲與再平衡政策之前，基於兩國軍事同盟關係，美日兩國即經常性地舉行例行年度聯合軍事演習。而在此之後，兩國則更加提升彼此的聯合軍演，其中又以奪島戰術演練做為近幾年來軍演的重點項目 (陳亮智，2017: 90; Tan, 2015: 8-9)。有關奪島戰術演練的開始，可追溯至 2006 年 (呂正韜，2012; 陳亮智，2017; Mauricio, 2014)，隨後的演習則包括有 2010 年 12 月的利劍 (Keen Sword) 聯合軍演，2011 年 1 月的山櫻 (Yama Sakura) 聯合軍演，2012 年 8-9 月的「島嶼防禦」聯合軍演，2012 年 11 月的「奪島」聯合軍演 (後來日本宣布終止此軍演)，2013 年 1-2 月的「鐵拳」(Iron Fist) 聯合軍演，2013 年 6 月的「黎明閃電」(Dawn Blitz) 聯合軍演，2014 年 11 月的「利劍」聯合軍演，以及 2015 年 8-9 月的「黎明閃電」聯合軍演等。2015 年 9 月，北京舉行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70 周年」紀念活動，並且在天門廣場進行規模盛大的閱兵典禮。很微妙地是，美國與日本選擇了缺席該活動。對此，若干西方媒體評論，北京的閱兵與武力展示恰恰引來國際社會對中國崛起的疑慮，其中尤以美日兩國為最 (Hatton, 2015; Jacobs, 2015b)。約莫同一時期，2015 年 7-10 月，美

²⁵ 相似的主張也出現在 2014 年的日本〈國家防衛計畫大綱〉(“National Defense Program Guidelines”) 當中，參考 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2014)。

日兩國也進行了「2015 黎明閃電」(Dawn Blitz 2015) 的聯合軍演，演習科目則包含奪島戰術演練及艦砲實彈射擊 (林翠儀，2015)。

本文認為，以上一系列的美日聯合軍演，其目標多是指向中國，情境則是釣魚臺列嶼可能被解放軍海軍所占領。此系列的聯合軍演與時機又極為吻合，即發生在列嶼諸島主權爭議不斷，而中國海軍又努力嘗試突破第一島鏈之時 (Scott, 2015: 131)。對美日而言，以日本所屬島嶼為敵人軍事占領，於是規劃由美日聯手以武力奪回；美軍著重在培養日本自衛隊的兩棲登陸進攻作戰能力，以利於增進其海上奪島作戰與海外作戰部署的能力。然而，對中國來說，美日兩國在日本周邊海域的軍事行動，非但無益於東亞的安全穩定，反而製造動盪與破壞穩定。對此，北京必須聲討美日聯合軍演。在中日雙方嚴重的互信不足下，美日又共同加強對釣魚臺列嶼的軍事狀況演練，如此只會引來中國更大的猜忌與不安。此非但無益於中日安全困境的舒緩，反而越是加深兩國的戰略競爭。

此外，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發展是，除了由美日兩國所進行的聯合軍演外，近來由美國與其盟邦、非盟邦之間所舉行的三邊 (或多邊) 聯合軍演，次數與頻率大幅增加。包括 2014 年 7 月與 2015 年 10 月，美國、印度與日本在位於印度南部的欽奈 (Chennai) 東方海域舉行代號為「馬拉巴演習」(Malabar Exercise) 的聯合軍演 (童倩，2015)。2015 年 7 月，日本首次參加由美澳兩國於澳洲北部霧灣 (Fog Bay) 所舉行的聯合軍演，演習項目即是從敵人手中奪回被占的領土之登陸作戰聯合演練 (〈日首次參加美澳軍演〉，2015)。2015 年 6 月，與中國在南海發生主權爭議的菲律賓，則分別與美國、日本在南海具有爭議的島嶼附近舉行聯合軍演 (「南海情勢緊張」，2015)。另外，隨著南海主權爭議的加劇，中俄兩國宣布，2016 年 9 月，兩國於南海舉行「海上聯合 2016」的聯合軍演，以抗衡美日澳在南海

問題上所施加給中國的壓力 (徐維遠, 2016)。從以上美日兩國共同或分別與亞太國家所進行的聯合軍演看來, 美國、日本、菲律賓、澳洲與印度等國確實進行了一系列共同針對中國崛起及其可能威脅的反制動作。而此一趨勢則正好跨越了東海與南海兩大水域; 涵蓋的國家是在此兩水域與中國發生領土主權爭議, 或受到北京潛在軍事威脅的國家。值得觀察的是, 隨著俄羅斯的加入, 東亞的局勢似乎有可能演變成「中國+俄羅斯」力抗「美國+日本+菲律賓+澳洲+印度」的型態。一個非東海與南海國家的俄羅斯之加入是否會造成更為複雜的情勢? 此又是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發展。

2. 美國協助日本的武器購買

除前述的聯合軍事演習外, 日本在武器系統上的購買與更新, 以及美國在此當中的協助, 無異也是帶給中國諸多的焦慮與不安。同理, 中國在軍事武器上的快速進展, 一樣也帶給日本許多的焦慮與不安。2013年12月, 安倍晉三政府於新公布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NSS) 及新版的〈國家防衛計畫大綱〉 (“National Defense Program Guidelines”) 當中宣布, 為因應中國崛起所帶來的威脅, 日本將加強自衛隊的綜合機動防衛能力, 同時也規劃增設海軍陸戰隊「水陸機動團」以因應中國對日本所屬島嶼的威脅 (北岡伸一, 2016; 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2013; Japan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2013)。同時, 日本的國防預算在未來5年內將提高5%, 並且向美國採購最先進的F-35匿蹤戰鬥機 (28架), 以及增購潛艦 (7艘) (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2013), 其中包含2艘神盾級驅逐艦。屆時, 日本海上自衛隊驅逐艦總數將從47艘增加到54艘, 神盾級驅逐艦將從6艘增加到8艘 (Liff & Ikenberry, 2014: 73-74)。同時日本政府亦決定, 把陸上自衛隊的人數從目前的

15.4 萬人，增加到 15.9 萬人；2014 年至 2019 年將以 24.7 兆日圓（約 7.1 兆臺幣）向美國添購全球鷹（Global Hawk）無人偵察機以監控中國對東海島嶼的行動；並且購置魚鷹運輸機和水陸兩棲登陸車，以利海軍陸戰隊水陸機動團之迅速奪回被敵人所占領的島嶼（陳怡妉，2013）。安倍晉三首相同時也批評中國違反國際秩序，其所逕行劃設的東海防空識別區，以及中國船隻頻繁地騷擾釣魚臺列嶼附近海域，在在地對東亞區域的安全與穩定構成嚴重的挑戰。

準此，日本在新式武器的採購與更新上，的確是獲得美國極大的支持。同時華盛頓也希望藉此讓東京肩負起更大的防衛責任，以維繫東亞的區域安全（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2016b: 245）。然而，此舉將帶給北京極大的不安與威脅感。因為前述的歷史遺緒問題、雙方的民族主義與脆弱的互信基礎等，美國對日本之軍事購買提升的支持，勢必會造成中國的恐懼，而中國的回應之道必會加速、加大其軍事現代化而與前者相互抗衡。因此，依照安全困境理論的解釋，日本的武器購買，以及美國對它的支持，事實上並無益於中日戰略競爭的緩和，反倒是越起激化的作用。

三、美國對日本防衛政策重新定位的態度

美國重返亞洲之所以激化中日兩國的戰略競爭，其中另一個重要關鍵是美國對日本防衛重新定位的支持態度，這反映在以下四個議題當中：(1) 美日安保條約與美日防衛合作指針的修訂；(2) 有關釣魚臺列嶼主權的爭議；(3) 集體自衛權解禁；以及 (4) 新安保法通過。而此四個議題又是息息相關。

1. 美日安保條約與美日防衛合作指針的修訂

從冷戰時代以來，美日同盟與美日安保條約就是支撐東亞區域

安全最重要的基石；而在中國崛起和中國威脅論之下，美日安保體制的重要性更為明顯。美國總統歐巴馬於 2014 年 4 月訪問日本時即強調，美日安保條約不僅是亞太地區安全的重要基礎，其影響範圍更應擴及整個地區；對於中國的加強海洋行動趨勢，美日兩國同意加強合作，同時也希望中國能參與此地區的發展；美日雙方都明確反對以武力方式改變現狀 (White House, 2014)。本文認為，美日安保體系的強化是透過美日防衛合作指針的修訂而逐步地落實；而其中有一極為明顯的改變，就是在美日同盟獲得強化的同時，日本的安全防衛政策轉趨積極主動。從北京的角度看此一發展，很顯然地，這會是中國走向遠洋的一道障礙。

原來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是在 1978 年由美日兩國共同制定，1997 年進行修訂。2014 年 10 月，美日兩國政府達成協議，將針對 1997 年所修訂的指針再進行修訂；同年 12 月，兩國安全諮詢委員會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SCC)，也是所謂的「2 加 2 會議」(“2+2” Meeting)，開始進行新防衛合作指針的修訂。2015 年 4 月，雙方新修訂了指針以為美日同盟之強化與轉型的基礎。在新版本當中，兩國將他們的安全合作界定為 (1) 無縫確保日本的和平與安全；(2) 為地區及全球的和平與安全展開合作；以及 (3) 美日攜手應對新的戰略領域。其中，最重要的部分為「無縫確保日本的和平與安全」，並將日本的安全情境劃分為 (1) 承平時共同合作 (平時合作)；(2) 對日本和平與安全之威脅形成 (重要事態)；(3) 對日本遭受武力攻擊的回應 (存立危機事態)；(4) 對日本以外的國家之遭受武力攻擊的回應等四項 (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2015)。以上新劃分方式取代了舊版本之 (1) 平時；(2) 日本有事；(3) 周邊事態等三種情況劃分模式。換言之，新修訂的防衛合作指針是打破過去以「時間緊迫性」和「地緣接近性」的劃分與規範，而將美日

的合作空間變得更大、更靈活 (童倩, 2014)。²⁶ 此一更為擴大時間與地理範圍的界定, 無疑為日本自衛隊與美軍的反應創造更為寬廣的活動空間。而更具彈性、模糊的目標, 無疑是賦予美日兩國更靈活處理危機或軍事衝突的依據 (陳亮智, 2017)。對此, 從北京的角度而言, 雖然新的指針並沒有強調特定的事件或國家, 但是一個活動範圍更為寬廣, 處理手腕更為靈活的美日防衛合作規範, 它會是中國未來在遠洋發展上的嚴重羈絆 (郭育仁, 2015: 1)。

2. 釣魚臺列嶼主權之爭議

有關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修訂後的效應, 直接地反映在對釣魚臺列嶼主權爭議的問題處理上。近幾年來, 當中日雙方在釣魚臺列嶼議題上出現爭論的時候, 美國都會呼籲雙方保持冷靜, 並鼓勵兩造以和平的方式解決。但是, 由於美國承認東京對該列嶼諸島擁有管轄權, 並且認為它是美日安保條約所適用的範圍。本文認為, 此作法無異是「間接地承認」(implicitly recognize) 釣魚臺列嶼的主權是歸屬於日本, 雖然美國對於該列嶼諸島的主權並不任何的表態。

事實上, 美國對此的鋪陳由來已久。2010年9月, 美國時任國務卿希拉蕊即聲稱, 美國對釣魚臺列嶼的主權爭議問題不採取特定立場, 但美國一直都清楚表明, 島嶼是受美日雙邊條約所保護的一部分, 美國有義務保護日本。2013年1月, 希拉蕊與日本外相岸田文雄發表聯合聲明, 表示美國不會承認任何影響日本對釣魚臺列嶼之管轄權的「單方行動」(Quinn, 2013)。此外, 2014年2月, 美國

²⁶ 例如: 日本可能擔心中國利用民兵非法登陸釣魚臺, 依照舊的指針判斷, 這種情況還未達日本遭受武力攻擊狀況的「灰色地帶」(日本有事), 因此無法啟動美日防衛合作; 但新版的指針則強調「無縫」合作, 一旦釣魚臺問題對立升級, 美軍即可隨時介入。

新任國務卿凱瑞 (John Kerry) 則表示，美國會根據美日安保條約，保護釣魚臺列嶼不受到中國的攻擊 (“US Secretary of State,” 2014)。這樣的脈絡無疑說明了，在中日兩國爭論最嚴重的議題上，美國其實已經選邊站 (與日本同一邊)。華盛頓如此的選邊行動，一方面符合其美日同盟關係與對美日安保條約的遵守和實踐，另一方面也是對北京在該列嶼諸島主權爭議上的聲索予以否決，同時也對中國在東海區域的活動及遠洋軍力的投射，形成明顯的反制作用。

3. 日本國家集體自衛權之解禁

美國重返亞洲之所以導致中日戰略競爭益形激烈，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國支持日本尋求集體自衛權的解禁。²⁷ 因為自此之後的日本乃開啟「再軍事化」的行動，此無疑會造成中國極大的恐懼。日本安倍晉三內閣於 2014 年 7 月宣布，正式決定修改憲法解釋以解除限制日本許久的國家集體自衛權。其中認為在三個條件之下，日本為自我防衛可行使武力：(1) 日本受到武力攻擊或與日本關係密切的國家之受到武力攻擊 (此呼應了新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其國民權利有受到立即而明顯的危險時；(2) 為去除此危險，並保障日本的國家安全，而無其他合適的方法之時；(3) 該武力之行使必須是最小的限度。因此，若是集體自衛權可以獲得解禁，則不論是日本自身受到武力攻擊，或是與日本關係緊密的國家 (同盟國) 遭到武力攻擊，日本皆有權利以武力方式予以回擊 (楊明珠, 2014b)。就此而論，集體自衛權的解禁是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重大轉變；是

²⁷ 集體自衛權是一種國防概念，可視為海外出兵或介入他國戰爭的權利。它是一種進攻作戰的潛在概念，當與本國關係密切的國家遭受他國武力攻擊時，無論自身是否受到攻擊，都有用武力進行主動干預和阻止的權利。換言之，集體自衛權就是，一個聯盟所有的成員在其中一個成員遭受攻擊時，他們會進行相互武裝的援助，例如北約以及華約組織就是類似此概念的國家群體。

日本以「防衛」做為最正當的理由而行海外派兵；是賦予日本海外用兵的主動權與正當性 (legitimacy)。對此，美國則表示極力支持日本政府的作法，並聲稱將在 2015 年 4 月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之修訂當中予以落實。的確，集體自衛權的解禁稍後即反映在新修訂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當中。²⁸ 從北京的角度而言，很顯然地，美國對日本集體自衛權解禁的背書與支持，無疑是給東京在尋求國家正常化與提升軍事反應上一個莫大的鼓舞。而這樣的作為，無疑成為北京在邁向軍事強權的一道嚴重障礙。

4. 日本新安保法案的通過

新安保法案的通過，賦予日本海外用兵的合法性 (legality)。為避免修訂後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以及通過後實施的新安保法案有違憲之虞 (違反日本憲法第 9 條)，日本政府先對最基本的核心問題——集體自衛權，申請由內閣會議解釋其合憲性 (constitutional)，再進行立法 (新安保法案)，並落實在指導美日軍事同盟作為的行政規範 (防衛合作指針) 上，如此賦予日本國家軍事行為的正當性、合憲性與合法性。其過程約略如下：2014 年 7 月，安倍晉三內閣宣布，正式決定修改憲法解釋以解除限制日本國家的集體自衛權。同年 10 月，美日兩國政府安全諮詢委員會達成協議，將針對原先的防衛合作指針進行修訂；同年 12 月，美日雙方於華盛頓確認新修訂後的防衛合作指針之範圍與內容；2015 年 4 月，雙方公布了新修訂後的防衛合作指針。7 月，新安保法案首先在眾議院獲得通過；9 月，新安保法案繼而在參議院獲得通過。於是，讓日本自衛隊能

²⁸ 即符合新修訂防衛合作指針之安全情境第二項 (對日本和平與安全之威脅形成)、第三項 (對日本遭受武力攻擊的回應)，以及第四項 (對日本以外的國家之遭受武力攻擊的回應)。

在海外正式用兵的法源於焉完成，同時也強化了日本在海外使用武力的主動角色（陳亮智，2017: 91）。

所謂的新安保法，即指和平安全法制整備相關法與國際和平支援法兩法案，是將美日同盟所涵蓋的範圍從日本周邊擴大到全球，並且強化日本使用武力的主動性。首先，第一個法案和平安全法制整備相關法即是一套內容龐大的法律體系，包含了自衛隊法、武力攻擊事態法、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協力相關法律（含聯合國維和行動法）、重要影響事態法（原周邊事態法）、船舶檢查活動法與國家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等多項法律。其次，第二個法案國際和平支援法是針對當有需要共同面對的國際和平事態發生變化時，日本應該如何進行應對與支援該變化的相關法律規範。此一法案被視為是日本準備向海外擴軍與用兵的法源依據。原來，根據 1997 年所修訂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美日雙方已經將美日安保的防衛範圍從「地理概念」的專守「日本領土」，轉向以「情況概念」為主的「周邊事態」進行擴大。於是日本也因此而有周邊事態法的立法。隨後，為了因應並配合美國反恐戰爭的進行，日本則分別於 2001 年通過反恐特別設置措施，以及在 2003 年通過有事法制以支援美軍在伊拉克的反恐行動。2015 年新修訂的美日共同防衛合作指針則將美日同盟所涵蓋的範圍從日本周邊擴大到全球，同時也強化日本的主動角色。日本在國際上的軍事行為不再只侷限於聯合國的維和行動，也不再只侷限於支援美軍的活動。此外，即使日本自身並未遭受到軍事攻擊，自衛隊也可以被授權使用武力以支援遭受攻擊的友邦。因此，新安保法確實呼應了修訂後的防衛指針，呈現出相對的靈活彈性、擴大範圍，以及積極主動。而日本集體自衛權的解禁與合憲性解釋則是這些法案的重要基礎。

然而，如同對集體自衛權之解禁與合憲解釋一樣，日本國內的

民意對新安保法案的立法通過則是呈現了態度分歧的狀況，而且傾向反對的民意甚至是高於支持的民意。根據日本朝日新聞於 2015 年 9 月 21 日所發布的民調顯示，51% 的日本民眾是持反對的立場，持支持立場的日本民眾則是 30%；74% 的日本民眾認為安倍內閣並未善盡向大眾解釋該法之立法的職責；安倍內閣的支持度則滑落至 35%，不支持度則上升至 45%（“ASAHI POLL,” 2015）。若干批評亦指出，日本政府除了未向民眾做清楚的溝通與解釋之外，首相安倍晉三只是利用國會席次的優勢而強行通過新安保法罷了。而就美國的態度而言，當日本眾議院於 2015 年 7 月通過新安保法時，國務院僅表示美國無法評論該法案，因為此乃日本的國內事務。然而國務院也認為，日本長期以來一直是美國最重要的亞洲夥伴，因此美國會尋求加強與日本的夥伴關係，特別是軍事防衛上的合作（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5）。然而，當日本參議院於 9 月通過新安保法時，美國則表示歡迎（Sieg, 2015）。就以上美國的反應看來，華盛頓歡迎並且支持東京通過新安保法案，如此的態度的確也與先前美國在防衛合作指針、釣魚臺列嶼主權爭議，以及集體自衛權解禁等議題的立場一致。事實上，美國在以上議題所呈現「歡迎、支持」日本的態度，確實是為了回應中國的崛起，以及它的快速軍事現代化（陳亮智，2017：91）。而這樣的動作，無疑也成為北京在邁向軍事強權上的一道嚴重障礙。

伍、結論

在本文的論證當中，傳統上被認為是最具有抑制中日兩國發生軍事衝突的美日軍事同盟，在美國重返亞洲並尋求強化美日軍事合作之際，根據安全困境的理論邏輯，華盛頓反而鼓動、激化了北京

與東京走向可能發生軍事衝突的一端。華盛頓對北京與東京的戰略競爭影響，已從原先的「緩和作用」轉換成為「激化作用」。

就現今的情況來說，柯慶生於 1999 年所發表有關美日同盟與美日安保條約的「雙重壓制力量」論點，以及該同盟與條約之緩和中日安全困境的作用恐怕已不適用。但這並不是柯慶生教授的觀點錯誤，而是因為時空環境出現了重大的變遷——北京在經濟與軍事上的實質崛起。在 1990 年代，當中國的經濟與軍事實力仍未真正強大的時候，華盛頓在政策實務上或可以採取柯慶生所謂的「雙重壓制力量」以避免東京與北京陷入安全困境的邏輯而從事激烈的戰略競爭，進而危及東亞區域的安全與穩定。但是，在 2010 年代（約莫在 18-20 年之後），當中國已真正地成為政治、經濟與軍事強權，並且對華盛頓與東京造成安全威脅的時候，東京與北京之間的安全困境問題已悄悄地被打開來，美國在政策實務上則必須尋求更加強化與日本的軍事同盟關係，以共同對抗來自於中國的安全挑戰。同時間，日本則順勢推動其軍事安全政策的調整，朝向更為積極與主動的防衛態勢發展，而這背後當然有美國的歡迎與支持。準此，本文認為，依照安全困境理論的邏輯，中日兩國的戰略競爭只會更趨激烈，而非緩和。

對於以上的發展，北京與東京之間的戰略競爭可有緩和機會？一樣沿著安全困境的理論，則華盛頓必須在北京與東京之間做出「平衡」(balancing) 的動作以緩和雙方加大、加速對對方的反制。但這似乎並不容易，因為中國國力的崛起，美國必須用更大的力量以制衡中國的挑戰。同時，對因應中國崛起而尋求軍事更為積極主動的日本而言，美國恐怕也不容易說服日本放棄它的主張與訴求。何況，美國更需要日本的參與，而日本則更需要美國的支持——他們有共同的利益，也面對共同的威脅。

在此，本文提出「另一種可能的選項」(alternative) 之安全建制以緩和中日戰略競爭，並降低雙方爆發軍事衝突，即同時推動並加強「美中」與「中日」兩兩之間的軍事交往 (military engagement)，特別是類似空中與海上遭遇之安全行為準則及空中遭遇防止衝突準則之制度的建立。首先，在美中兩國的軍事互動上，2014 年與 2015 年所建立的避險機制——空中與海上遭遇之安全行為準則及空中遭遇防止衝突準則兩項，預期應該有助於兩國避免在海域和空域上發生軍事摩擦或衝突。若是美中之間的軍事衝突能獲得避免，日本將不至於被捲入美中軍事衝突當中，則東京與北京爆發軍事危機的可能性將大為降低，但雙方的戰略競爭可能依然存在 (因為中日雙方有根深蒂固的戰略競爭根源，參照本文第參節)。其次，在中日兩國的軍事互動上，雙方必須努力建立起軍事安全合作機制，盡量避免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建議仿效美中兩國的遭遇安全準則，若是中日兩國之間也能有空中與海上遭遇之安全行為準則及空中遭遇防止衝突準則，則可預見的是，雙方在東海上爆發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將大為降低。或許北京與東京雙方不易建立起軍事安全合作機制，也或許雙方之軍事安全合作機制的建立對他們的戰略競爭緩和作用有限，但終究都是邁向中日安全的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

參考文獻

- 〈日首次參加美澳軍演自衛隊官員：展示對華包圍圈〉(2015年7月13日)。《中國評論通訊社》。取自 <http://www.nanzao.com/> (“Japan’s officer joining U.S.-Australian military drill for the first time: Shows encirclement against China.” [2015, July 13]. *China Review News Agency*.)
-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2014年7月1日)。〈外交部發言人洪磊主持例行記者會〉。取自 http://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1_673025/t1170302.shtml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4, July 1]. *The daily briefing by Hong Lei*.)
-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2015年9月19日)。〈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就日本國會表決通過新安保法案答記者問〉。取自 http://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t1298011.shtml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5, September 19]. *The daily briefing by Hong Lei on the passing of new security act by the National Diet of Japan*.)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2015年5月26日)。〈《中國的軍事戰略》白皮書 (全文)〉。取自 <http://www.scio.gov.cn/zfbps/gfbps/Document/1435341/1435341.htm> (The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5, May 26]. *China’s military strategy*.)
- 北岡伸一 (2014)。〈轉向「積極和平主義」的日本安全保障政策〉，《Nippon.Com 日本網》。取自 <http://www.nippon.com/> (Kitaoka, S. [2014]. Japan’s security policy: Return to “active pacifism.” *Nippon.Com*.)
- 史坦伯格、歐漢龍 (2015)。《中美新型戰略關係：走向戰爭還是走向合作？》(蔡曉卉譯)。臺北：大雁。(Steinberg, J., & O’Hanlon, M. E. [2015]. *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S. H. Tsai, Trans.]. Taipei: As If.)
- 李文 (2014年7月1日)。〈中韓迅速回應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BBC 中文網》。取自 <http://www.bbc.com/> (Lee, W. [2014, July 1]. China and South Korea quickly respond to Japan’s lift of the

right of collective self-defense. *BBC*.)

呂正韜 (2012 年 8 月 27 日)。〈美日“奪島”演習實戰色彩濃軍事戰略富挑釁性〉，《中國新聞網》。取自 <http://dailynews.sina.com/> (Lu, C. T. [2012, August 27].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conduct a realistic exercise of seizing islands: Strategic provocative to Beijing. *China News Service*.)

林翠儀 (2015 年 9 月 3 日)。〈與中別苗頭美日聯合軍演〉，《自由時報電子報》。取自 <http://news.ltn.com.tw/> (Lin, C. Y. [2015, September 3]. U.S.-Japan joint military drill: Competes with China. *Liberty Times Net*.)

〈南海情勢緊張 菲本週與日、美陸續聯合軍演〉(2015 年 6 月 24 日)。《自由時報電子報》。取自 <http://news.ltn.com.tw/> (Tens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Philippines joins U.S.-Japan military drill this week. [2015, June 24]. *Liberty Times Net*.)

徐維遠 (2016 年 7 月 30 日)。〈中俄 9 月南海軍演意在威懾美日〉，《中時電子報》。取自 <http://www.chinatimes.com/> (Syu, W. Y. [2016, July 30]. China-Russia joint military drill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September: With intention to deter U.S. and Japan. *China Times*.)

郭育仁 (2014a)。〈日本武器出口政策淺析〉，《台北論壇》。取自 <http://140.119.184.164/view/136.php> (Kuo, Y. [2014a]. Analyzing Japan's policy of weapons export. *Taipei Forum*.)

郭育仁 (2014b)。〈解析日本 2013 年《防衛計畫大綱》〉，《台北論壇》。取自 <http://140.119.184.164/view/117.php> (Kuo, Y. [2014b]. Analyzing Japan's 2013 national defense program guidelines. *Taipei Forum*.)

郭育仁 (2015)。〈解構 2015 年美日防衛合作指針〉，《台北論壇》。取自 <http://140.119.184.164/view/228.php> (Kuo, Y. [2015]. Deconstructing 2015 U.S.-Japan guidelines for defense cooperation. *Taipei Forum*.)

陳怡妏 (2013 年 12 月 18 日)。〈防堵中國 日砸七兆軍購：買 F-35 戰機設陸戰隊捍釣魚台〉，《蘋果日報》。取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 (Chen, Y. W. [2013, December 18]. Containing China: Japan spends seven trillion for arms procurement. Buying

- F-35 fighters and establishing marines to defend the Senkaku islands. *Apple Daily*.)
- 陳亮智 (2009)。〈尋找解釋美中戰略競爭的驅動力量：安全困境，權力平衡，或是權力轉移？〉，《中國大陸研究》，52, 1: 87-128。(Chen, L. C. [2009]. Searching for the driving forces behind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Security dilemma, balance of power, or power transition? *Mainland China Studies*, 52, 1: 87-128.)
- 陳亮智 (2011)。〈亞洲的新軍備競賽：權力轉移催促下的安全困境問題〉，《戰略與評估》，2, 2: 37-56。(Chen, L. C. [2011]. Asia's new arms races: The security dilemma problem urged by power transition. *Defense Strategy and Assessment Journal*, 2, 2: 37-56.)
- 陳亮智 (2017)。〈美、中兩國在東海與南海之戰略競爭的比較——兼論日本的角色〉，《全球政治評論》，59: 81-104。(Chen, L. C. [2017]. A comparison of U.S. and China's strategies in the East China Se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And Japan's role on the controversies. *Review of Global Politics*, 59: 81-104.)
- 張雅君 (2005)。〈中日關係的安全困境：國際體系與雙邊利益層面的分析〉，《遠景基金會季刊》，6, 4: 139-184。(Chang, Y. C. [2005]. Security dilemma in Sino-Japan relations: An analysis based on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bilateral interest.” *Prospect Quarterly*, 6, 4: 139-184.)
- 童倩 (2014年10月9日)。〈日美修訂《防衛合作指針》中期報告〉，《BBC 中文網》。取自 <http://www.bbc.co.uk/> (Tong, C. [2014, October 9]. Japan and the U.S. revise the mid-term paper of *the guidelines for their defense cooperation*. *BBC*.)
- 童倩 (2015年10月14日)。〈美日印聯合軍演登場被指針對中國〉，《BBC 中文網》。取自 <http://www.bbc.com/> (Tong, C. [2015, October 14]. U.S.-Japan-India joint drill is considered as directed against China. *BBC*.)
- 路西 (2014年7月1日)。〈日本內閣會議決定解禁集體自衛權〉，《BBC 中文網》。取自 <http://www.bbc.co.uk/> (Lu, S. [2014, July 1]. Japan's cabinet decides to lift the right of collective self-defense. *BBC*.)
- 楊明珠 (2014a年4月24日)。〈歐巴馬：釣魚台適用美日安保〉，

- 《中央社新聞》。取自 <http://www.cna.com.tw/> (Yang, M. C. [2014a, April 24]. Obama: the Senkaku islands are under U.S.-Japan security cooperation. *Central News Agency*.)
- 楊明珠 (2014b 年 7 月 31 日)。〈日解禁自衛權 民反鄰國憂〉，《中央社新聞》。取自 <http://m.cna.com.tw/> (Yang, M. C. [2014b, July 31]. Japan's lift of the right of collective self-defense: Citizens oppose and Japan's neighbors fear. *Central News Agency*.)
- 劉屏 (2014 年 1 月 25 日)。〈美國要求安倍不再參拜靖國〉，《中時電子報》。取自 <http://www.chinatimes.com/> (Liu, P. [2014, January 25]. The U.S. asks Abe not to visit Yasukuni Shrine again. *China Times*.)
- 蔡增家 (2012)。〈美國重返亞洲與日本防衛政策的轉變〉，《海峽評論》。取自 <http://www.haixia-info.com/articles/6256.html> (Tsai, Z. J. [2012]. U.S. return to Asia and the change of Japan's defense policy. *Straits Review Monthly*.)
- 蔡曉穎 (2015 年 9 月 19 日)。〈中國：日本通過安保法戰後「前所未有」〉，《BBC 中文網》。取自 <http://www.bbc.com/> (Tsai, S. I. [2015, September 19]. China: Japan's pass of new security act is "unprecedented." *BBC*.)
- Art, R. J. (2003). *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ASAHI POLL: 51% oppose security laws, 74% criticize Cabinet's explanation to public." (2015). *The Asahi Shimbun*. Retrieved from <http://blogblogs.com/#!/post/6708285/asahi-poll-51-oppose-security-laws-74-criticize-cabinets-explanation-to-public>
- Auslin, M. (2016). Japan's new realism: Abe gets tough. *Foreign Affairs*, 95, 2: 125-134.
- Beckley, M. (2015). The myth of entangling alliances: Reassessing the security risks of U.S. defense pact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9, 4: 7-48.
- Brooks, S. G., Ikenberry, G. J., & Wohlforth, W. C. (2012/2013). Don't come home, America: The case against retrench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7, 3: 7-51.
- Brunnstrom, D. (2016, September 16). Japan to boost South China Sea

- role with training patrols with U.S.: Minister. *Reuters*. Retrieved from <http://www.reuters.com/>
- Bush, R. (2010). *The perils of proximity: China-Japan security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Calmes, J. (2011, November 18). Obama's trip emphasizes role of pacific rim.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nytimes.com/>
- Campbell, K. M. (2016). *The pivot: The future of American statecraft in Asia*. New York: Twelve.
- Christensen, T. J. (1999). China,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 4: 49-80.
- Christensen, T. J. (2011). *Worse than a monolith: Alliance politics and problems of coercive diplomacy in Asi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hristensen, T. J. (2015). *The China challenge: Shaping the choices of a rising power*. New York: W. W. Norton.
- Clinton, H. (2011).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189: 56-63.
- de Mesquita, B. B. (2006).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eople's power, preferences, and perceptions*. Washington, DC: CQ Press.
- Friedberg, A. L. (2011).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New York: W. W. Norton.
- Global Firepower. (2016). *Comparison results of world military strengths: Military power comparison results for Japan vs. China*. Retrieved from <http://www.globalfirepower.com/countries-comparison-detail.asp?form=form&country1=japan&country2=china&Submit=COMPARE>
- Hatton, C. (2015, September 2). What is China trying to prove with military parade? *BBC News*. Retrieved from <http://www.bbc.com/>
- Herz, J. H. (1950). 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2, 2: 157-180.
- Hornung, J. (2015). Japan's pushback of Chin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38, 1: 167-183.

- Jacobs, A. (2015a, May 26). China, updating military strategy, puts focus on projecting naval power.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nytimes.com/>
- Jacobs, A. (2015b, September 1). As China's economy falters, military parade offers chance to burnish image.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nytimes.com/>
- 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2012). *Press conference by the defense minister (Satoshi Morimoto)-September 28*. Retrieved from http://news.xinhuanet.com/2012-09/25/c_113201683.htm
- 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2013). *National defense program guidelines for FY 2014 and beyond*. Retrieved from http://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4/pdf/20131217_e2.pdf
- 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2015). *The guidelines for U.S.-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mod.go.jp/e/d_act/ampo/pdf/shishin_20150427e.pdf
- 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2016a). *Defense of Japan 2016, part I: Security environment surrounding Japan, chapter 1: Defense policies of countries, section 3: China*. Retrieved from http://www.mod.go.jp/e/publ/w_paper/2016.html
- 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2016b). *Defense of Japan 2016, part II: Japan's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and the Japan-U.S. alliance, chapter 1: Basic concepts of Japan's security and defense, chapter 4: Strengthening of the Japan-U.S. alliance, section 3: Initiatives to build the foundation for strengthening the alliance*. Retrieved from http://www.mod.go.jp/e/publ/w_paper/pdf/2016/DOJ2016_2-4-3_web.pdf
- Japan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2013).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Tokyo: Ministry of Defense.
- Jervis, R. (1976).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Jervis, R. (1978).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30, 2: 167-214.
- LaGrone, S. (2015). *Japan commissions largest warship since World War*

- II. Retrieved from <https://news.usni.org/2015/03/25/japan-commissions-largest-ship-since-world-war-ii>
- Liberthal, K. (2011). The American pivot to Asia: Why President Obama's turn to the East is easier said than done. *Foreign Policy*. Retrieved from <http://foreignpolicy.com/2011/12/21/the-american-pivot-to-asia/>
- Liff, A. P., & Ikenberry, G. J. (2014). Racing toward tragedy? China's rise, military competi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9, 2: 52-91.
- Mamnyin, M. E., Daggett, S., Dolven, B., Lawrence, S. V., Martin, M. F., & O'Rourke, R., et al. (2012). Pivot to the Pacific?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rebalancing" toward Asia.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trieved from <http://www.fas.org/sgp/crs/natsec/R42448.pdf>
- Mastanduno, M. (2002). Incomplete hegemony and security order in the Asia-Pacific. In G. J. Ikenberry (Ed.), *America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pp. 181-210).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Mauricio, T. (2014). *The future of US-Japan military exercis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4/07/03/the-future-of-us-japan-military-exercises/>
- Mearsheimer, J. (2011). Imperial by design. *The National Interest*, 111: 16-34.
- Montgomery, E. B. (2006). Breaking out of the security dilemm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1, 2: 151-185.
- Parameswaran, P. (2015). *Japan launches new helicopter destroyer*. Retrieved from <http://thediplomat.com/2015/08/japan-launches-new-helicopter-destroyer/>
- Parry, R. (2016, September 30). Japan steps up arms race as tensions rise in South China Sea. *Tim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thetimes.co.uk/>
- Pollmann, M. (2015). *Japan's first steps into the world of arms exports*. Retrieved from <http://thediplomat.com/2015/01/japans-first-steps-into-the-world-of-arms-exports/>

- Pyle, K. B. (2007). *Japan rising: The resurgence of Japanese power and purpose*.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 Quinn, A. (2013, January 18). Clinton assures Japan on islands, invites Abe to U.S. in February. *Reuters*. Retrieved from <http://www.reuters.com/>
- Ratner, E. (2013). Rebalancing to Asia with an insecure Chin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36, 2: 21-38.
- Russett, B., Starr, H., & Kinsella, D. (2007). *World politics: The menu for choice* (8th ed.). Belmont, CA: Thomson/Wadsworth.
- Samuels, R. J. (2007). *Securing Japan: Tokyo's grand strategy and the future of East As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cott, D. (2015). The American pivot and China's maritime power: Impact and response. In G. Kennedy & H. V. Pant (Eds.), *Assessing maritime power in the Asia-Pacific: The impact of American strategic re-balance* (pp. 115-134). London: Routledge.
- Shirk, S. L. (2007).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ieg, L. (2015, September 17). Japan takes key step to passage of security bills despite protests. *Reuters*. Retrieved from <http://www.reuters.com/>
-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2014).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arms transfers 2014*. Retrieved from <https://www.sipri.org/publications/2015/sipri-fact-sheets/trends-international-arms-transfers-2014>
-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2015).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arms transfers 2015*. Retrieved from <https://www.sipri.org/publications/2016/sipri-fact-sheets/trends-international-arms-transfers-2015>
-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2017).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milex>
- Sutter, R. G. (2006). *China's rise: Implications for U.S. leadership in Asia*. Washington, DC: The East-West Center Washington.
- Tan, A. T. H. (Ed.). (2015). *Security and conflict in East Asia*. New York:

- Taylor & Francis.
- Tang, S. (2009). The security dilemma: A conceptual analysis. *Security Studies*, 18, 3: 587-623.
- Taniguchi, T. (2012). China's rise: Changing contours of Japan's foreign policy. In S. T. Devare, S. Swaran, & R. Marwah (Eds.), *Emerging China: Prospects for partnership in Asia* (pp. 182-200). London: Routledge.
- United Nations. (2016). *National accounts main aggregates database*. Retrieved from <https://unstats.un.org/unsd/snaama/dnllist.asp>
-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6).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6*. Washington, DC: Author.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0). *Remarks on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Retrieved from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09/146917.htm>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5). *Daily press briefing*. Retrieved from <http://www.state.gov/r/pa/prs/dpb/2015/07/244998.htm#JAPAN>
- US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Kerry vows to back Japan in East China Sea. (2014, February 8).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Retrieved from <http://www.scmp.com/>
- Walt, S. M. (1987).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altz, K. N.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 White House. (2014). *Joint press conference with President Obama and Prime Minister Abe of Japan*. Retrieved from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4/04/24/joint-press-conference-president-obama-and-prime-minister-abe-japan>
- White House. (2015).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5*. Washington, DC: Author.
- World Bank. (2016). *GDP ranking of the World Bank*. Retrieved from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GDP-ranking-table>

Examining the Impact of the U.S. Return to Asia on Sino-Japanese Strategic Competition (2011-2016) —A Perspective of the Security Dilemma Theory

Liang-chih Evans Chen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 TransWorld University
No. 1221, Zhennan Rd., Douliu City, Yunlin County 64063, Taiwan
E-mail: liangchihevanschen@gmail.com

Abstract

What is the impact of the U.S. return to Asia on Sino-Japanese strategic competi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as Washington pivots to the Asia-Pacific, situation of their competition deteriorates quickly. Previously, the U.S.-Japan alliance, as described in Thomas Christensen's theory in 1999, possessed *dual deterrence* and was able to preserve peace and stability in East Asia—deterring military threats from China and North Korea, and preventing the remilitarization of Japan. Currently, however, these functions have been disrupted by Chin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and challenged by Japan's security transformation. The key to this situation is Beijing's rise, economically and militarily, in recent years. This development is subtly undermining Christensen's 1999 argument that the U.S.-Japan alliance could resolve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the China-Japan security dilemma and lower the likelihood of arms races, military confrontations, and war between these two nations.

Key Words: return to Asia, strategic competition, security dilemma, U.S.-Japan alliance, arms races